咏远有李

李强 著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法图麦·李（1）
- 法图麦·李（2）
- 法图麦·李（3）
- 法图麦·李（4）
- 法图麦·李（5）
- 法图麦·李（6）
- 吾妻哈文（1）
- 吾妻哈文（2）
- 吾妻哈文（3）
- 吾妻哈文（4）
- 吾妻哈文（5）
- 吾妻哈文（6）
- 吾妻哈文（7）
- 吾妻哈文（8）
- 吾妻哈文（9）
- 吾妻哈文（10）
- 吾妻哈文（11）
- 吾妻哈文（12）
- 李氏父子（1）
- 李氏父子（2）
- 李氏父子（3）
- 李氏父子（4）
- 李氏父子（5）
- 李氏父子（6）
- 因“血统”而夭折的画家（1）
- 因“血统”而夭折的画家（2）
- 因“血统”而夭折的画家（3）
- 陨落的“中国帕瓦罗蒂”（1）
- 陨落的“中国帕瓦罗蒂”（2）
- 大学，唯一的逃离之路

- 考进央视，一定是狗屎运（1）
- 考进央视，一定是狗屎运（2）
- 考进央视，一定是狗屎运（3）
- 《幸运52》缘起（1）
- 《幸运52》缘起（2）
- 《幸运52》缘起（3）
- 《幸运52》缘起（4）
- 《幸运52》缘起（5）
- 当砸蛋遇上扯淡（1）
- 当砸蛋遇上扯淡（2）
- 当砸蛋遇上扯淡（3）
- 当砸蛋遇上扯淡（4）
- 当砸蛋遇上扯淡（5）
- 当砸蛋遇上扯淡（6）
- 当砸蛋遇上扯淡（7）

法图麦·李（1）

一日，在北京羊坊店派出所，我给我女儿办户口。

按说她那么大点儿，有没有户口也无所谓，可是我觉得既然已经是个人儿了，就办了吧。她出生之前我们商量过，一脱离母体，就是个社会人，不是我们俩的私有财产，我们当父母的，只不过是帮社会抚养她。

录入姓名的时候，片儿警捣鼓了半天，问我："系统里只有'下圆点儿'，行吗？"

我说："同志，卡尔·马克思的那个点儿，在下面还是在中间？在下面，那是两个人，一个叫卡尔，一个叫马克思。在中间，才是一个人。没有就给我画一个！"

户口本拿到，姓名一栏写着：法图麦·李。

【闺女大了，还不怨我一辈子？】

很长时间以来，我认为孩子就是"第三者"，坚决不能要。

结婚以后，我和哈文恣意享受着二人世界。

宿舍里从不开伙。白天在外面，下馆子，哪儿好吃奔哪儿去，为餐饮业做了不少贡献。晚上回来，想看录像看录像，想打牌打牌，想约朋友约朋友，想睡觉睡觉。

最大的爱好之一，是俩人并排坐阳台上听隔壁家两口子吵架。说是吵，其实只有一个愤怒的女声："你放手！放手我不打你！"第二天一问，原来是男的跟食堂里的服务员多说了两句话。这位大哥还是我们央视的顾问，在家被老婆连顾带问，日子过得没我快乐。

我们的生活，无拘无束，天马行空。老觉着没玩儿够，共同抵制"第三者"，一抵制就是10年。

直到有一天，哈文特认真地跟我说："你不觉得屋里挺冷清吗？"

"嗯？怎么冷清了？不是玩儿挺好吗？"我警惕地盯着她。

"要不，咱要个孩子？"

“哦……要孩子啊？”我挠挠头，沉思半晌，最后横下一条心。

“行，零件齐备，咱现在就搭流水线，制造开始！”

没过多久，哈文告诉我：“有了。”

哟，挺快哈？机器好使！好家伙，我奔超市，买果汁，买话梅，买酸奶，买一切孕妇爱吃的东西。买回来往哈文面前一堆，“老婆，可劲儿吃！”

两天以后，哈文郁闷地告诉我：“弄错了，没有。”

“我！”我挺窝火。

冷静片刻，立马儿又改了口，“老婆，不急，咱继续制造。”

这么折腾了好几回，就连超市收银员都一看见我就乐。

直到那一天，哈文说：“好像真的有了。”

“老婆，别老‘诈和’了！咱先查清楚了，行吗？”

结果，这次是真的。她乐了，我傻了。

太突然了吧？“来路不明”的第三者成功入侵，我们家得变成什么样啊？

2001年11月10日午夜，怀着说不清楚的心情——惶恐，期待，忏悔，都有点儿，我写下了第一篇“宝宝日记”。

一个生命的孕育是那么神奇。据说直到现在，许多大学问家也无法解释清楚。人，真是个了不起的物种，真是和别的动物不同。因为人的后代会逐渐形成思想并思考问题，而且定会超过前人。

感叹之余，我衷心感谢我的妻子，她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能够再次目击自己的成长历程。

除了爱，只剩下焦急的期待。

一开始写，就停不下来了，期待是一天一天紧跟着脚儿的。每天，无论我在北京，在外地，睡觉前，还是路途中，我都会和小宝宝絮叨几句。文章开头千篇一律：“亲爱的小宝贝，你好吗？”

最初，多是抒发初为人父的焦虑、惶然，为自己这么多年抵制“它”的到来而忏悔，就怕将来有一天他妈把不住嘴说出来。后来便

成了流水账。大到中东战事，巴以纷争，小到和哈文的一次口角，或春节前的家庭大扫除。甚至工作中的不顺心也要讲一讲，譬如对长官有啥意见，有啥看法，今天谁欺负我了，替你老爸记着他！

法图麦·李（2）

有时候在外地出差，睡不着，凌晨4点多还要写上一篇。有时候写了两三篇都不过瘾，后面还附一篇。有时候在家里，晚上做完胎教，哈文先睡了，隔一会儿就叫我帮她翻个身。我等着伺候她老人家，又没其他事做，也用写日记来打发时间。每一篇都记着某月某日，几点几分，我怕这些事儿自己老了以后忘了。

宝宝的日记本是好友杨惠珊送的。杨惠珊曾是台湾电影“金马奖”影后，20年前和丈夫共同建立“琉璃工坊”，投入中国现代琉璃艺术。在上海时，我常常光顾她的咖啡厅“透明思考”。

日记本里印着很多琉璃工坊的工艺品照片。本来我就习惯竖排字，繁体，写的时候还要特别小心绕开这些花儿。哈文一看就起急：“你费劲不费劲啊？”我笑眯眯地告诉她：“我不费劲。我幸福。”

我们住的单身宿舍只有11平米。一想到要当爸爸了，要养家，要给孩子尽可能好的生活，我就觉得肩上担子挺沉。于是我开始拼命到外地演出，不久以后给了个词儿，这叫“走穴”。哈文大着肚子，无数次在首都机场接我，送我。最惨的一次，我所有的现金、证件、银行卡、演出税单，还有哈文送我的钱包，都丢了。很辛苦，但是除了那个钱包，我都不介意。

和其他孕妇相比，哈文的肚子一直不算大，看上去尖尖的，胎心强劲有力。参考了方方面面的说法，对比各种数据指征，我们认为肚子里是个男孩儿。小衣服小玩具，也都是按男孩儿准备的。我把宝宝的胎心录下来了，没事儿就趴在被窝里听，老觉得“它”在叫我。

有一天，例行B超检查，男士止步。我跟妇产科主任挺熟，就揣着DV混进去了，对着显示屏一通乱拍。

医院有规定，“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”，不许告诉男孩儿女孩儿。可咱是“名人”啊，可以破回例。况且我信心十足，问，也不过就是证实一下。

我边拍边问：“是男孩儿吧？”

B超室主任对着屏幕仔细看了看，回答：“闺女。”

“啥？闺女？”

我和哈文面面相觑，半天缓不过神儿来。

记得那是2002年3月20号，北京下了第一场沙尘暴，整个世界都是昏黄的。

回到家里，我们一下午不说话，也不开手机，看着婴儿床上那些蓝色、黄色的小衣服发呆。

直到晚上天黑透了，我打开灯，扒拉一下哈文，“老婆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的脸。”

“看什么呀？”她很不耐烦。

“你说就我这张脸，扎俩小辫儿，那得什么样儿啊？闺女长大了还不怨我一辈子？”

【咱宁可轴点儿，也别花！】

预产期是2002年5月29日。我说不行，提前剖！我疼我媳妇儿，不想让她受罪。再说了，我的女儿，必须跟我一个星座，反正在肚子里呆够37周就熟了。

真无聊。可是爱就是这么自私。而且对我来讲，怎么自私都不过分。

那一年5月21日出生的孩子就是双子座了。不都说双子花心吗？我家闺女宁可像我，轴点儿，也别花！于是手术日期定在5月20日，当天打早头一例。给哈文“掌刀”的是京城名医金燕志大夫，人称“金一刀”。

一大早我就赶到医院。管停车场的师傅喜欢看我节目，每天专门给我留车位。我在病房的窗台上放了一只小鱼缸，里面是我送给女儿的两条红色小金鱼。

可气的是，所有护士都进去看李咏老婆生孩子，就不让李咏本人进去！我站在手术室门口，干着急没办法，只好把DV交给护士，嘱咐

她一定把我女儿出生的全过程都拍下来。

法图麦·李（3）

8点15分，我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，实施麻醉。

手术室门框上方的红灯亮了：手术中。我屏气凝神，在心中数秒。祈求各路神仙菩萨，都来保佑她们母女平安。

15分钟以后，突然听见“哇”的一声哭，尖尖的，细细的。老天爷，我闺女出来啦！嗓门儿够亮的啊！可是只哭了几声又没动静了。

哦，估计给孩子洗澡呢，多乖啊，一声不吭的。

我老婆咋样啦？这会儿是醒着呢？睡着呢？

我在门口浮想联翩，不停地看表。5分钟过去了，10分钟过去了，还不出来，想急死我啊！

正在这时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手术室门开了。我下意识地来了个挺胸抬头立正站好。

“女孩儿，6斤8两！”一个小护士脆生生的声音。

“砰！”门关上了。

我保持立正姿势，回味着，陶醉着。多么激动人心啊！我当爸爸了！

哟，没给家里报喜呢！我赶紧掏出手机给我妈打电话。

正低头拨着号，“哗啦”，门又开了。还是刚才那小护士，探出半拉脑袋说：“女孩儿，6斤4两！”

“砰！”门又关上了。

我愣了一下，冲里面大喊一嗓子：“那4两哪儿去了？”

后来看了录像才知道，小家伙太可爱了，称体重的时候一直在尿尿。大夫直说：“宝贝儿别尿了，再尿咱还得称一回。”更绝的是，剪脐带的时候，她那一双小手紧紧抓住大夫的剪刀，贼大劲儿，掰都掰不开。

又过了大约5分钟，一位护士抱着我女儿出来了，她闭着眼睛，睡得挺香。我向每一位医生、护士鞠躬，认识不认识都谢谢。

“谢谢您把孩子洗这么干净。”

人家忍俊不禁，说：“还没洗呢，剖腹产本来就挺干净的。”

走廊上堆满了朋友送来的鲜花，声势浩大，一溜排开，得有二十多米。不敢放在房间里，怕孩子花粉过敏。结果护士们个个都过敏了。

我让医生先送孩子回房间，自己留下来等哈文。相濡以沫这么多年，要是这会儿，我只顾护着那个刚出世的小家伙儿，也太不仗义了。老婆安全，才全家安全。

哈文精神很好，一点儿没受罪。录像显示，当“金一刀”倒拎起孩子，“啪”一拍脚，“哗”一撸脸，哭出声后抱起来，放在妈妈怀里，让妈妈吻一下，哈文表情木然，完全没找着当妈的感觉。

【我就是她爹，而且是亲爹】

陪哈文回到病房，望着她们一大一小，我的心像被什么暖融融的东西紧紧地包裹住了，俩字：踏实。突然想到一个词：大爱无疆。怎么形容这种爱呢？它连边儿都找不着，比无疆还无疆。

女儿真可爱啊，皮肤红红的，毛茸茸的。脸蛋比茶杯盖儿大不了多少，小拳头攥着，也就是个鹌鹑蛋。再比比小脚丫，还没我小拇指长呢。

她长得多好看啊，小鼻子小嘴，就是眼睛还有点儿睁不开，睫毛也还没长出来。她身上流着我的血，她就是我，我就是她。她笑我就笑，她疼我就疼。

我正趴小床边全神贯注地看呢，“阿嚏！”小家伙突然打个喷嚏，吓我一跳。闺女，行啊！刚出来这么会儿，打嗝放屁全无师自通啦！

中午，我把手机设置成免提状态，接通了几个大寺。按照穆斯林的习俗，电话那一端，大阿訇们诵起《古兰经》，为我初生的女儿祈福。

女儿出生前，我们请过一位德高望重的阿訇为她取名字，个个寓意深远，富贵吉祥。有“高人”指点我们说，女儿像她妈，阳气足，挺

倔，要选一个阴柔点儿的“压一压”。于是我们选了“法图麦”这个女孩气十足的名字。一个月以后，我们偶识的另一位大阿訇才道出其中深意：法图麦，就是圣人的女儿。

法图麦·李（4）

我倒吸一口冷气：闺女，你这名字是真不赖。

法图麦像我，打从出生就懒。何以见得?

她妈妈奶涨得厉害，她小嘴吮不住，只好先用吸奶器吸，我再拿奶瓶喂给她。第一次给女儿喂奶，看到她嘟起小腮帮子起劲儿地吮吸奶嘴，一副很舒坦很满足的样子，我哭了。哈文后来告诉我，那段时间我莫名其妙总是流泪，头回发现我挺多愁善感的。

奶瓶这东西好啊，不用吮，倒过来就往下滴。女儿躺在我胳膊弯里，开始还猛嘬，后来发现了，不嘬也有，那就别受累了，张嘴等着吧。我就给她滴，她躺在下面挺惬意地吧唧嘴儿。

要不怎么说青出于蓝胜于蓝呢? 追求享乐和她爹如出一辙，悟性可比她爹高得多。享受了一回，第二回就知道了。隔了俩小时，又该喂奶了，我刚把她抱起来，奶瓶拿在手里，人家直接把嘴张开等着了。

好，爸爸给你滴！女儿面前，我就是没原则，就是没立场。

小孩儿出生头几天，一般就是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很少睁眼。法图麦不一样。整个白天不睡觉，睁着眼睛到处看。医学上讲，新生儿视力很弱，只能看到很短的距离，也不知她整天整天地在寻摸什么，倒是不哭不闹的。

到晚上开始哭了，哭得那叫一个伤心，谁也哄不住，除了她老爸。

只要我把她往怀里一抱，轻声说："小宝贝，我是爸爸。"她立刻就安静了，紧紧紧紧地贴在我怀里，无比踏实。

哈文怀孕期间，每天晚上10点，只要我在家，一定准时进行胎教。开场白都是一样的："小宝贝，我是爸爸。"她一听见，马上有反应。哈文的肚子开始起伏跌宕，这里鼓一下，那里鼓一下，看来玩得挺开心。

本来在那儿呆得挺好，愣被一下子提溜出来了，又亮又吵不说，刚出来就被打了好几针，孩子能不委屈吗?

三天以后，她周围声音太多，乱了。老爸的安抚也不灵了。铆足了劲儿地哭，哭累了为止。

法图麦降生以后，我的“宝宝日记”就写不下去了。原因只有一个，我见到她了，了却了“期待”，另一种全新的爱在心中蔓延开来。

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，这是谁总结的啊？太精辟了。我对她是看不够，想不够，疼不够，爱不够。她身上的味儿啊，比什么香水都好闻，都亲切。对我来说，从她在妈妈肚子里落脚，慢慢长大，到出生，成为我的亲人，这个过程，仿佛与我和她妈妈从相识相知到执手偕老，如出一辙，没有任何改变。我心里只有深深的幸福，深深的感恩。

做了父亲我才发现，心灵感应这回事，绝对是有的。记得法图麦一岁的时候，我去外地出差，从出家门开始就莫名其妙觉得不舒服，有哪儿不对。

飞机落地后刚挺稳，我就打开手机给家里打电话，问女儿好不好，他们说：“没事，忙你的吧。”

整整一白天，我都心神不定，怪了，从来没有过啊。我又给家里打了几个电话，还是告诉我没事儿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搭最早一班飞机赶回北京，到家一问，果然！小阿姨一眼没看住，法图麦在茶几上磕了一下，嘴唇被牙硌破了，流了不少血。

小阿姨一边说，一边抽抽搭搭哭起来。我大为光火，要不是她哭，我连动手打人的心都有。她当时也就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孩子，估计吓得不轻。

现在想想，小孩子嘛，磕磕碰碰都正常。可哪个当爹的不护犊子啊?

法图麦周岁生日那天，我们请了摄影师来为她拍照。在楼下的小区里，摄影师让我把她悠起来，像坐飞机一样，“呼啦”飞起来，“呼啦”落下去，把她乐得啊。她一乐，我也有点儿得意忘形，再一飞，用力过猛，整个身子都歪过去了，基本上与地面呈45度角。

法图麦·李（5）

摔一家伙是必然的了，关键是怎么摔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我当即把整个胳膊都垫在女儿身子底下，选择了一个她绝对安全的角度，轰然倒地。她没事儿，我整个胳膊都划烂了，那场面，惨不忍睹。

哈文在旁边看着，来了一句："嗯，你像个爹。"

我老婆不愧是O型血啊，就这么冷静，完全没有别人家老婆可能表现出的惊慌失措。说她是表扬你吧，话里话外听不出任何感情色彩。说她是挖苦你？也不是，这评价相当有高度了。

只能说，爱是装不出来的。我就是她爹，而且是亲爹！

人类基因真厉害。法图麦不会爬，爱打岔，话痨，行动能力差，全是我的遗传，不用教！

都说小孩子"三翻六坐，七挠八爬"，我这女儿什么都会，就不会爬。哈文一度感到担心，怕她是"发育迟缓"，我拍着胸脯向她打保票：

"看我！看你老公！有问题吗？有毛病吗？我小时候就先学走后学爬，告诉你啊，没事儿！老话说，不会爬的孩子聪明，知道吗？"

我从小爱给大人打岔，父母经常警告我："大人说话，小孩儿不许插嘴！"但我耐不住，不让我说我难受。

现在，我女儿跟我一样一样的。有时候你说正事，她"咣"地插一杠进来，听上去还挺有礼貌，"我能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吗？"

"行，行，你发表。"急不得恼不得。

再有就是话密，天知道她的话怎么那么密。思维还倍儿跳跃，老得关注她的话头儿在哪儿，一会儿就蹦了。她说话特早，早得我都害怕。八个月会叫爸爸妈妈，十个月能和大人简单交流，一岁两个月就自己唱卡拉OK了。

等她长到五岁，我们俩凑一块儿逗贫，我就逗不过她了。越逗不过还越想逗，把她逗急了就这样：

“法图麦，爸爸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”我眉眼挤作一堆，谄媚地问。

“轴呗！”一脸的不屑。

“那，你觉得爸爸是什么类型的人？”

她白眼一翻，“找抽型！”

到底是亲爹，咋说我都没脾气。

逗她玩儿，实际上是给自己解闷儿。有时候我在书房工作，特别是录节目之前，准备文案，一件特较劲的苦差事。我行动能力差呀，凡事能拖则拖，拖到不能拖为止。我可能会说服自己起个大早，冲个澡，喝几杯咖啡，然后在书房里坐下，看看书，看看盘，把整个白天都耗过去了，晚上才来开夜车，头悬梁锥刺股！

法图麦还添乱，在外面发出各种声音。我在屋里听着，心里痒痒啊。本来我就纠结得厉害：“我是出去呢？不出去呢？”

琢磨半天，下定决心出去了，跟她逗会儿，跟家人聊会儿，又进书房。

刚坐定要干活儿，她又弄出响动了，我又开始挣扎：“我是出去呢？不出去呢？”

这么着，一天就过去了。

晚上哈文下班回来，我问她：“你说我这样对不对？”

还没等她开口，我自己回答：“我觉得是对的。”

然后，轻手轻脚溜到法图麦的卧室里，去和她道晚安。

“哎呀，爸爸你又来啦！真烦真烦真烦！”

“不许烦，过来！”

我把闺女搂怀里，亲额头，亲鼻尖，亲嘴唇，亲下巴，亲脖子，亲左脸蛋，亲右脸蛋，一共七下。

“Good night， Helen!”Helen是她的英文名字。

“Good night， Daddy!”还是一脸不情不愿。

这是我发明的程序，每天必须履行，一步也不能少。

得逞以后回到书房，一夜不睡，干活！

【千万别“赢在起跑线上”】

法图麦·李（6）

法图麦太幸福了。

从她出生到现在，7年来，我们拍摄了无数盘录像带，记录她成长的美好瞬间。每一盘带子上都有标签，时间、地点、主要事件，按顺序整整齐齐排着。我们一家人最大的乐趣，就是围在露台上看录像，看到滑稽处，她也“格格”乐个不停。

每年的周岁生日，我们都带她去拍照，每一次季节交替，我们也带她去拍照。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美国，英国，法国，意大利，澳洲，北欧，马尔代夫……我就是她忠诚的御用摄影师，一路跑跑颠颠跟在她屁股后头，生怕漏下每一个可爱的小动作和生动的表情。

她的书架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录像带、相册、像框、卡片。

哈文看着直犯愁：“要不以后少照点儿？一年一次？”

“不行！”我当即否决，“必须照！咱那书房不还空一半呢？”

遥想当年，我都上初中了，照相还是个稀罕事儿呢。谁没事儿花钱照相啊？好不容易有张相片，都留着当信物。我有本书借给女同学，还回来的时候里面就夹张一寸照片，害得我爸还审我半天。

所以法图麦应该幸福，这是一个家族几代人的积淀。就像我的童年也远远强过我的父辈、祖父辈。套句特俗的话，这就叫时代的车轮在前进。您羡慕也赶不上，后悔也来不及。

我对她没太高要求，就六个字：健康、阳光、快乐。别人都说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不，我生怕我女儿“赢在起跑线上”。

我们这代人少年时承受的压力够大了，天天被催着赶着：“考不上大学，死路一条，知道不？”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！”全是这。

新疆相比内地，地缘上偏远些，相对闭塞些。但这些内地流行的口号，不出五年，就到新疆了。那玩意儿，要命啊！为了大学，我嘴唇上还落了个疤，永远掉不了。

法图麦的童年跟我比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

在学校里她叫Helen Lee。Helen是个挺平常的英文名，她自己起的，我们就尊重她的意见。

四岁参加学前班考试，老师用英语提问，学生回答Yes or No，正确率50%以上方可入学。在会议室里，老师每提一问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Helen同学的答案就已经脱口而出。小样儿，还挺自信！这要是在《幸运52》打擂台，我基本上只有歇菜的份儿。

说英文我肯定远不如她了。前年我们去英国，在一家咖啡馆里，我装出很酷的样子跟服务员说："Coffee， one， please."别看咱词汇量小，胆儿大，敢说。接着又派头十足地补充一句："No music."

服务员傻那儿了，看我半天，心想这跟喝咖啡有什么关系吗?

法图麦这时候老沉稳了，不动声色地解释了一句："No milk."

哟，我不得不对我闺女另眼相看，咋这么出息啊？基因好，没办法。

法图麦6岁的时候，我教育她："大姑娘了，以后打嗝放屁要打报告！"

她很不解："为什么？"

"这是一种起码的礼貌，特别是家里有客人的时候。你报告爸爸，爸爸告诉你应该去哪里。当着客人面发出这种声音，不是丢我人吗？"

照章执行了一段时间，有天晚上我们正吃饭，她突然举手："爸爸，我打个小报告！"

嘿，怎么成小报告了？这事儿咱得说道说道。

我用了20分钟的时间，给她解释"报告"和"小报告"的区别。好不容易解释明白了，她问我："爸爸，我们班谁谁说谁谁不好，算不算打小报告？"

"不算！"

我又用了大约10分钟，告诉她"小报告"和"背后说人坏话"的不同。

在这点上，我和哈文高度一致。和孩子交流，一定说通说透，别说得她似懂非懂，增加执行难度。今天说不清楚，咱宁可不睡觉。

“总之，打小报告和背后说人坏话都是不光彩的，你不可以做。让我发现一次，”我坏笑地看着她，捏起她一边脸蛋，咬牙切齿地说，“我亲你一千遍，亲得你脸肿！”

“不要啊！爸爸我怕！”她跳后一步捂住脸，夸张地叫起来。

“怕就听爸爸话！”

您问我为什么亲她？打我舍不得啊！

哈文断言法图麦和我一样，A型血。舍不得让她扎针，我们没验过。

法图麦的一些做派，跟我极像，比如慢性子。

一天早上，姑姑送她上学，马上就迟到了。好在家离学校近，一街之隔，走路两分钟。

姑姑急吼吼地催：“法图麦，快点儿！”

人家法图麦可不急，对着镜子正描唇彩呢，描得可仔细了。她们学校这点儿挺好，张扬个性，任由发挥，随便你打扮得多么奇形怪状，老师一律报以真诚热情的赞美：“Beautiful！”

“别描了！迟到了！”

“着什么急呀？”法图麦从镜子里瞥了姑姑一眼，慢条斯理地说，“不就过个天桥吗？”

我在旁边看着闺女乐啊，这场面，整个儿一个经典回放。

想当年他老爸我在新疆拍片，采访自治区主席阿卜来提·阿卜都热西提。主席的司机在酒店楼下等，我们制片主任催得火急火燎：“快快快！迟到了迟到了！”

我老人家站在镜子前□不慌不忙的，干吗呢？拿个小梳子梳眉毛。边梳边安慰他：“着什么急啊？反正已经迟到了。”

“梳梳梳，有完没完？！”主任怒发冲冠。

我完全不为所动，“我就这爱好。让他等会儿，没事儿。”

哈文是典型的急性子，嫌我和法图麦太慢，关键时刻掉链子，经常生气说：“我是光有一闺女吗？我这是一儿一女啊！”

要么就是试图拉拢我，和我统一战线：“李咏，给她带个好头儿行吗？”

“我就不。”我摇头晃脑地，故意气她。“知道龟为什么长寿吗？它慢啊。”

不着急的能把着急的弄疯了。

吾妻哈文（1）

【19岁，一见钟情】

我爹告诉过我，上大学，有几件事很关键，头一件就是交女朋友。

但是上大学以后好几个月，我都很自闭，不和同学来往。老觉得自己是偏远地区来的，和大城市的孩子们玩儿不到一块去。

每周末我都去中央美院学画画，那会儿还是老教学楼呢，晚上就住在协和医院后面的小平房里，学生宿舍。

去美院得坐公交车。经常是这样，我在马路这边等车的时候，就看见我们班一帮男生女生在马路对面，也等车，结伴出去玩儿。我们播音系只有一个专业，一个班级，学生人数39，据说是建院以来最多，男女生一半一半。

很多女生对我感兴趣，我是她们餐后寝前的话题人物：这个男生很怪，不说话，走哪儿都背个画夹子。

但我只对其中一个女生感兴趣，她就是哈文。

在阶梯教室上课，哈文恰好坐在我右侧，我们俩中间隔着楼梯。我用右眼瞄她，侧脸轮廓很美，就这么一眼，我对她“一见钟情”。

上课时，我常常骚扰她。我从本上撕纸，用铅笔给她画像，速写，画完以后用圆珠笔细细涂，慢慢磨，弄出立体感来。

涂磨好了，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，我就伸过胳膊去捅她。

“哎，哎！”我嘴里叼着笔，斜眼觑着老师，拿俩手指头夹起那张纸递过去。

“讨厌！”她白我一眼，“嚓”地把画抽走，一脸不屑。

我完全不知趣地一笑，再撕张纸，接着画，画完又递给她。

“你上不上课？”她又白我一眼，嘴角却忍不住向上挑一下。

我知道，有戏了！

开学后不久，快到圣诞节了。我们班同学聚在一起包饺子，其实也是找机会热闹热闹。哈文是穆斯林，大家就和她的饮食习惯，专门从回民营买了羊肉馅。

我自己瘦，所以偏爱胖乎乎的女孩儿，哈文特别符合标准。吃完饺子，大家一块儿跳“黑灯舞”。我搂着哈文三步两步乱转，正值青春期，血脉贲张，心想此时不表白，何时表白？

“哈文，你心目中的男朋友什么样？”我心怀叵测地问。

“至少一米八吧！”

一句话把我噎住了。上来就说身高，这不明显冲着我来吗？但人家话已经说到这儿了，绕也绕不开。我只好多问了一句：“最底线呢？”

她迟疑了一下，很认真地想了想，说：“怎么也得一米七五吧。”

这么说我就有自信了。我底气十足地告诉她：“上礼拜体检，我一米七五五！”

表白之后，哪想麻烦了，她不理我了。

伤自尊了？不至于吧，我没说什么出格的话啊。

没看上我？有可能，但可能性不大。小伙子长挺帅，挺有异域风情，再说她看我画还老偷着笑呢。

过了些日子，看我没头苍蝇似的，她估计也不落忍，约我到了个地方，很委婉地说：“那事儿，我爸不同意。”

“为啥不同意啊？”我猴急猴急的。

说起她家，大家伙儿都觉得挺神秘。开学第一天，哈文是坐着一辆小轿车来的。那时候的学生都思想简单，即便如此，也没人瞎猜她到底什么来头，还是一样地平常相处。直到后来，我第一次去她家，和她爸见面，也不知道老人家到底是干什么的。

“我爸说，现在还年轻，以学习为重。”她很听父亲的话。

“咱俩除了一块儿吃饭就是一块儿学习，没干别的啊！俩人学不比一人学好吗？”我摆事实讲道理，挑战她爸的权威。谈恋爱就耽误学

习？偏见。

见她有点儿答不上来，我乘胜追击：“你觉得我怎么样？”

吾妻哈文（2）

“挺好的。”

“那不就完了吗？你觉得我好，我也觉得你好，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吗？”

那时候她没我心眼儿活，我说两句她就无言以对了。

“你再考虑考虑，啊？”我巴不得她马上表态。

“我……再想想吧。”最后她犹犹豫豫地来了一句。

一朝没搞定，我开始装颓废，整天闭门不出，不见人，不刮胡子。本来就瘦，一蓄了胡子，更显得憔悴、沧桑。我鼓捣班里男生把这阵风儿吹到哈文那儿去：瞧瞧李咏，为了你，都成什么样了？

当然了，这只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则是当我遇到哈文的时候，表现得十分清高，根本不带侧目的，让她也尝尝啥叫失落。怪了，我不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啊，可是恋爱面前，这些小心眼儿、鬼主意，想都不用想就来。

一次，我帮同学排话剧，当导演。刚好哈文也和同宿舍的女生一起来看。我远远地看见她来了，激动啊，心脏“通通通”猛跳。但我不理她，更不和她说话，假装特酷特投入。

“那谁，你这个地方动作可以再大点儿！”

“你，语气再强烈点儿！”

我知道她看我呢，所以表演得格外卖力。过了一会儿她走了，估摸着已经走了挺远，我特想回头看她一眼，还是忍住了，告诉自己：“别回头，万一被她发现了呢？”但我知道，她对我的好感肯定多了一层。

平时上小课，我的声音条件很好，老师猛表扬。我知道女生们私下里也少不了议论：“咱们班李咏声音多好听啊！”男生议论女生，女生议论男生，是学校里最让人提神的事儿。她们一议论，我自我感觉倍儿良好，心说：哈文要是不动心，才叫怪呢！

1988年的元旦对于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那天晚上，我买了两张票，请哈文看演出。当然，票是托一位女同学带给她的，我们俩座位不挨着，省得招她烦。还是这位女同学，演出结束后又帮我捎了句话："李咏在西配楼后面的小花园等你。"

她还真来了。站在一片核桃林旁边，我开门见山地说："哈文，咱们俩别彼此折磨了。"

"什么叫彼此折磨啊？"哈文把重音放在"彼此"二字上。

"我知道，你也挺挂念我的。"

"我挂念你？哼！"在她眼里，我分明就是个剃头挑子。

殊不知，我可是有备而来，今天要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，决不罢休。

"哈文，我是个很认真的人，你别老羁押着我。我爸说，让我上大学找个女朋友，我就看你挺好的，就愿意你当我女朋友。凭我这条件，你吃亏吗？要么你现在就宣判我死刑，我就再没这念想了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要么你就……"

本来我是打好腹稿的，说着说着就即兴发挥了，最后一弯腰，"呗儿"从地上拔起一朵野花，"你要是同意，就把这花接过去，不同意就别动。说吧，就这么点事儿，简单！"

闷了好一阵儿，她都没说话。最后，她一伸手，把花拿走了。

是谁说的"路边的野花不要采"？大错特错！野花是有生命的，更是有使命的。一朵野花，就这么改变了李咏的一生。

【"征服"奶奶，等于搞定全家】

寒假很快就到了，她回宁夏，我回新疆。对于刚刚陷入情网的两个年轻人，这一个月真是太漫长了。特别是春节，全家老小都在，可就是心里欠得难受。

我每天都给她写一封信。信的内容无非是我今天做了什么，明天要做什么，无时无刻不想念你之类。最绝的是，为了讨她欢心，信封都是我自己做的。单做一个信封当然也没什么特别，关键是信封上的

字都是我一个一个画上去的，任谁乍一看，也看不出和印刷上去的有何区别。

吾妻哈文（3）

细说画字的过程，那是相当麻烦。先拿铅笔轻轻打格，然后找份报纸，把要写的字挑出来，依样一个个“画”在信封上，标准的“印刷宋”。画字也有讲究，先用铅笔打底，再用钢笔描，横平竖直，字间距相等。最后，轻轻用橡皮把铅笔的痕迹擦掉。

哈文说我，这哪儿是写信啊？纯属骗女孩呢！

怎么能说骗呢？咱是饱含着真情实感的，要说“讨好”倒是不错。一大早起床就折信封，折完开始画，等画完了一抬头，外面天擦黑了。我容易吗我？哪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看见我这信封，不得疯了？

我所有的信，哈文都留着，满满两大盒子，搬了几次家都没丢掉。我偶尔没事儿，拿出来欣赏欣赏，“小伙子太有才了！”

不过常常招来哈文的控诉：“你写的信我都留着，我写那些信呢？就算我字不好，没保存价值，你态度也太不端正了吧？”

一番话说得我，无言以对，找个空溜之大吉。

1988年4月13日，是我们确定恋爱关系后，第一个哈文的生日。

正是感情突飞猛进的时候啊，哈文的室友和我一起策划了一场“宿舍PARTY”，想给她一个惊喜。大概只有在那个年龄才会如此，恋爱虽然是两个人的事，可很多时候更像是大家的事。

女生宿舍楼男生不让进，男生宿舍楼女生随便进，这完全有悖于“男尊女卑”之中国传统思想，十分不合理！

还是哈文的室友仗义，帮忙帮到底，免费为我提供服装道具。我穿上一件女士大衣，系一条大红色的围巾，再戴上帽子和宽边眼镜，镜子前一照，能上《大众电影》封面了，美！

这么着，一群叽叽喳喳的女生簇拥着一个扭扭捏捏的“女生”来到了宿舍楼下。看门老大爷刚想仔细端详端详，就被姑娘们围住问长问短，有点儿招架不住。趁着乱，我一溜烟钻了进去。

刚一进门，给哈文吓一大跳：这谁啊？怪里怪气的！

待我款款宽衣解带，除去乔装，哈文乐得差点儿背过气去。

生日PARTY结束，已经不早，我急着赶在锁门前溜出去，一慌就把帽子落在了屋里，这下麻烦大了。

行至楼下，埋头疾窜，被老大爷高声喝住：“站住！什么时候进来的？”

惊得我一哆嗦，站是站住了，就是不敢抬头。周围有些进出的女生看到有个男扮女装的在这儿出洋相，哈哈乐出了声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今晚就是专门给大家送欢笑的。

“我……我刚进来的。”我用蚊子的声音说。

“不对吧！你哪个班的？男的女的？”

看来老大爷是不打算饶过我了，我只好泼皮耍赖，谁怕谁啊。

“你仔细看看，你说我男的女的？”

争端是怎么结束的，忘了。87级播音系男生李咏乔装打扮混进女生宿舍讨好女朋友，迅速在校园里传为佳话。

一年以后，1989年春节，我这个丑女婿上门去啦。哈文提前透了口风给我，她爸是个大孝子，搞定她爸，首先要搞定奶奶，奶奶高兴，全家高兴。

坐火车到宁夏已是傍晚，第一件事就是拎着礼物去三伯家看奶奶。奶奶长，奶奶短，嘴儿是要多甜有多甜。奶奶喜欢得不行，拉着我的手不放。

“这小伙子，好，白净！要是我们家哈文像你这么白就好啦。想当初我年轻的时候，也白着那！”

此后任何时候，我们回宁夏老家，第一件事都是看奶奶。“征服”了奶奶，后面自然一路绿灯。大姑大姨大姐一律说好，皮肤白净，细嫩，会说话，手好看，懂事儿，一见我就喜笑颜开。

吾妻哈文（4）

和哈文家人一起聊天，我才知道她父亲不简单，是一位中共高干。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就被任命为本溪市税务局长，周恩来总理亲笔手书的委任状。1958年，他赴宁夏负责成立回族自治区的筹备工作。

听到这段历史，我对准岳父肃然起敬。别看我在家是老疙瘩，不怎么干活儿，到了这儿，可有眼力见儿了，特会献殷勤。准岳父起得早，每天早上6点，他起我也起，他做早饭，我打下手。

几年以后，我们大学毕业，哈文被分到天津电视台工作。我送她过去，受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驻天津办主任的热情款待。席间，还说起一段往事。

就在我向哈文表白心迹的时候，正赶上她父亲到北京办事，她就向父亲提到了我，父亲当时表示不同意。这也就是我有一段时间“备受折磨”的原因。而老人家的考虑，其实不仅仅是“以学习为重”。

离开北京，他的下一站是天津，一到地方就召见办事处主任，吩咐道：“赶紧给我女儿物色个男朋友，必须是穆斯林，研究生！”

我虽然保持穆斯林的生活习惯，户口本里民族一栏却是“汉”。看来在老人眼里，这是个大问题。

到了第二年，我已经将哈文一家老小“拿下”，顺利通关，父亲又去天津视察。天津办主任犯愁地汇报说：“您嘱咐的事儿，我一直想着呢。可我们这边儿回族的研究生不太多，还没碰上合适的。”

“嗨！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？”父亲大手一挥，“甭找了，人都带家里去了，老太太带头同意！”

【会赚钱的女婿才是好女婿】

谈恋爱这事儿，投入挺大，不光是感情，还有资金。

那时候家里每月给我寄100块钱，一个人凑合够用，俩人可差远了去了。总得讲点儿浪漫吧？讲点儿情调吧？

记得那次，我们在东四的大华影院看电影，散场后出来，饿了，去旁边一家咖啡馆买了一个汉堡包。说是汉堡包，其实就是个三明治，不到5分钟吃完了。知道多少钱吗？10块！

我心疼木了，一路都在念叨："贵死了！贵死了！"

哈文后来特记恨我，这男生怎么这么小气，讨厌！

"行啦行啦，花都花了还扯什么呀？"她不耐烦地说。

那个月刚过一半，我的钱就花光了，只好厚着脸皮去找哈文。

"哎，媳妇儿。"

"呸！谁是你媳妇儿？"她对我怒目而视。

"行行，哈文，行了吧？"我赶紧识相地改了口，"那什么，我这月没钱了，要不把你的钱拿出来，咱一块儿花，行吗？"

这可是初恋啊，最忌讳谈的就是"钱"。可是没钱追什么女孩儿，不是扯吗？我可不想打肿脸充胖子。

后来的很多时候，每当哈文展开"如果你可以整天在家呆着多好"的幻想，就会遭到我的无情打击。

"我也想整天在家啊，在家呆着怎么挣钱？家里生活怎么维持？最后我不是偷楼上的，就是偷楼下的，信吗？这是现实问题。"

我说的是大实话，却令哈文恼火得很。不解风情，就知道钱！

话又说回当年，穷则思变，我挣钱的首选途径是配音。去中央电化教育馆给影视教学资料配音，每分钟6毛钱。几千字的稿子，15分钟配完，能挣9块。我们班当时有二十多个人去面试，最后就留下我一个，因为我踏实。15分钟的片子，我之前要看上一整天，熟悉内容，对口型。运气好的时候，一个月下来能挣一千多。80年代末，绝对大款了。

后来又找了个来钱更快的活儿，在内蒙古饭店一层的歌厅里当驻店司仪，每天晚上主持两场演出，工资一天一结。

吾妻哈文（5）

哈文唱歌很好，当年代表七大艺术院校参加过全北京市的大学生巡演。我觉得这种事吃力不讨好，没劲。要玩儿就玩儿真的。

“别尽给我现眼，既然是我媳妇儿，跟我出去！”

“呸，谁是你媳妇儿？”哈文一把把我的手打开，“出去干什么？”

“挣钱！”

“挣钱？”她犹豫了一下，“能挣多少？”

“钱不多，我努力！”

说完，我拽着她来到内蒙古饭店，介绍她当驻唱歌手，开始了“夫唱妇随”的兼职生涯。算起来，一个月赚的钱少说也有一千多。

有钱了，就开始臭美。谁让我骨子里就臭美呢？我们俩所有的衣服，都是我亲自设计的“情侣款”，我们一起坐公交车去买布料，拿到定福庄附近的一家小裁缝铺里做。我做事马虎，有时候人下车了，面料却落在座位上，找也没的找，经常挨哈文骂。

穿上自制情侣装，如果只看腰部以下，我们俩就是一个人，裤子的款式、花色一模一样。几年以后，出了一个叫陶金的摇滚青年，带火了短款西服和萝卜裤。哈文作证，这身行头，早他好几年我就已经发明了。

说起钱的好处，还真是一言难尽。

每回她的同学、朋友到学校里来玩儿，都是我慷慨解囊，去小卖部买酸奶招待他们。现在说来，酸奶不值什么钱，在那个年代还是挺奢侈的。况且架不住一来就来四五个，有的还特不拿自己当外人，“我就爱喝酸奶，来俩！”

心里疼不疼另说，我脸上始终热情洋溢，“大家随便喝，哈文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！”

“哈文，你男朋友不错啊！”“来俩”的那位开始说我好话。

“什么呀？这就是我男同学！”哈文纠正道。

气得我，咬牙也不是，切齿也不行。只好笑里藏刀加以补充：“我是她关系特好的男同学。”

我一向自认为财商不低，何况男人为自己心爱的女人挣钱，天经地义。配音、司仪、驻唱，挣的都是小钱，真正称得上“第一桶金”的是1991年。朋友办了个小公司，我帮着倒腾了几笔买卖，半个月赚出了别人几年的工资。当然，绝对不违法。

揣着钱，我跟哈文回宁夏拜见岳父母，腰杆不由得直了许多。

之前哈文老跟我说，她三伯的女儿懂事，工作两年，给家里换了台29英寸的彩电。这弦外之音我懂。

坐在未来的老丈人面前，我从包里拿出一摞人民币，潇洒地往桌上一放，“这是我孝敬您的，明天给您买台新电视，我已经看好了，29寸松下。”

环视客厅一周，我看沙发也挺旧了，看上去灰扑扑的，还是20年前的样式。于是我又拿出一摞人民币，“这钱，买套皮沙发，带拐角的。这套该淘汰了。”

老头儿打心眼儿里受用，哈文也跟着长脸。啥样的女婿叫万里挑一？答案不言自明啊。

一扭头，看见哈文姐夫过来了，“姐夫，来，坐坐！看看我给你带的什么。”我弯腰从地上拎起一个纸箱子递给他，“日立888录像机，咱以后在家也能看录像了！”

“嚯，这家伙得多少钱？”姐夫喜出望外。

“小意思，您就可劲儿看吧。”

这天，一家人皆大欢喜。最有面子的就是哈文。

第二天早上我睡过头了，睁眼一看表，8点整。坏了！闹钟怎么没响啊？还得帮老头儿做饭哪！我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床，手忙脚乱地穿衣服，突然有人敲门，轻轻的三下。

“李咏，起来了吗？早饭已经准备好啦！”居然是准岳父的声音，老人家亲自来叫我吃早饭！我一时间还真有点儿恍惚。

吾妻哈文（6）

穿戴齐整出门，洗脸刷牙，然后来到餐桌前一看，嗬，待遇真不一样，连茶都沏好了。

我吃着饭，哈文的妈妈又是慈爱又是心疼地说："孩子，刚挣钱，省着点儿花，往后日子长着呢。"

"哎，你懂什么！"准岳父忙在一旁打断，"这孩子心里有数着呢，知道挣俩只花一个。"

我两边点头，"您二老说得都对！"心里却在偷着乐。这可真是，从奴隶到将军啊！

【这姑娘不会被谁骗走了吧？】

我和哈文，曾经结婚10年不要孩子，就我们俩自己玩儿，因为热恋的时候总是分开，分怕了。分开是郁闷的，分开是猴急的，分开是想念的，怎么办？唯有看书，借书来打发时间，寄托情感。25岁之前，我读遍了尼采、荣格、弗洛伊德……与恋人分别催生出一个多愁善感的哲学青年。

大二暑假实习，我在上海新闻台，她在无锡电视台，整整一个月没见面，简直百爪挠心。

我当时所在的栏目叫"浦江之声"，早上5点半到6点直播，我的工作时间从早上5点开始，一直要忙到晚上10点多。一天还好，天天如此，就十分枯燥难捱。

我一个人住一间宿舍，房间里有个小电视机，那时没有太多好看的节目。大上海对我来说，就是一个陌生的花花世界，所以每天，我除了想哈文，想第二天的直播，余下的生活就是在屋里吃泡面，看书。

有一天，我的导师卢嗣华微服私访到了上海，来我房间里看了看。

"你平时都看什么书？"

我从枕边拿起一本递给她，她惊得非同小可，一劲儿打量我，眼神有点接近于“肃然起敬”。

“你看《资本论》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看得懂吗？”

“看不懂。”我老老实实地说。

“你想入党？”

“我想早点儿睡觉。”

相思之苦啊。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，那叫什么滋味儿？我不读《资本论》，难道去读汪国真诗集，那不是找死吗？

一个月，那本简明版《资本论》居然读完了，尽管每天看不了几页就睡着了，醒了起来接着看啊，咱有的是时间。我敢说到现在为止，在我的同龄人里，能读完《资本论》的没几个。要问懂没懂，懂得不多，但至少知道了什么叫“剩余价值”，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恩怨。最后还得出一个歪论：燕妮夫人多么不容易啊！

我父亲和岳父都说过，读大学不是学专业，专业也学不完，关键是要在大学期间学习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，这才是受用终生的。

同理，我对《资本论》理解得深入还是粗浅并不重要，关键是我见识过了。时隔多年，您跟我说起上句，我能大致对出个下句。更何况，它还帮我催眠了呢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被分到中央电视台，唯一的一个播音员名额啊，本来是一件大喜事。据说老家十里八乡都轰动了，整天高朋满座，我妈忙得都招呼不过来。甚至有些过去没能平反的“黑五类”也来找我爸了，“托你儿子向中央说个情。”

要是真那么天遂人愿，人生不就太平淡了吗？谁承想，还没摸清楚央视大楼子里面什么样，我在顺义接受完10天保密培训，就直接被发派到西藏电视台播《西藏新闻》去了，一去就是一年。对于一个沉浸在热恋中，同时满怀抱负的年轻人，这是多么沉重的一个打击啊。

那年我23岁，一个人在西藏，开始读尼采。这个年龄的人，谁会读尼采呢？只有两种，一种是绝望的人，一种是有信念的人。到现在，我都不敢确认自己属于哪一种。

吾妻哈文（7）

我承认尼采说的，孤独是强者的伴侣，可此时的孤独压得我难以喘息。我想哈文想得发狂。很难说这种想，有多少是出于爱她，多少是在安慰自己。虽然还不至于想成神经病，但也快了。

又开始每天一封信，倾诉思念，倾诉孤独。写信是一天中最让我期盼的事情，只有写信，我才感到幸福。多数时候竖着写，时间来不及就横着写。字尽量不写繁体，怕她不认识。虽然在我多年的熏陶下，她对繁体字的辨识度有了大幅度提高，但遇上欢快的“欢”、大众的“众”这类，简体繁体外形出入较大的，还是一头雾水。

写完信我就给她画信封，招数还是老的好使，轻车熟路。反正我有的是时间。只有在写写画画中，我的心跳才是真实的。

西藏到天津有多远？我心急啊，恨不得今天写的信明天就到。

我在信封上画了一个小飞机，飞机长得胖乎乎挺可爱，还忽闪着一对大眼睛。飞机下面挂着一块方形的小牌子，上写“航空”二字。

我以为写上航空，就航空了。

第二天，我还想航空，但不想画飞机了，于是画了一个火箭。火箭屁股上挂着一个条幅：航空。

第三天，与其让她睹物思人，不如干脆直抒胸臆。我在信封上画了一个光着身子的小“丘比特”，张弓搭箭，瞄准远方爱人的心。身后扑棱着一对翅膀，一边一个字：航空。

看来看去，觉得全裸不妥，航空不得让空姐看见吗？怪不好意思的。于是又在丘比特两腿中间画上了一片树叶子，好歹挡挡。

我们俩大约每周通一次卫星电话，每次只能说几分钟。可是通了好几次电话，她还是没有收到我的“航空邮件”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别说当时根本没有航空，就是有，也得先去邮局交了钱，人家才给你航空。

终于等到快要回来的日子了。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，我又在灯下给哈文写信：

夜已深了，可我睡不着，想着和你相见，想着见你以后该说些什么，想着那一刻的心情和感觉，反正是什么都想，复杂极了。

一年就快过去了，叹一声，时间真是飞逝。说来也奇怪，平日里总觉得时间过得慢。站在意识之外去观察，似乎用来形容时间速以流逝的句子，要远比哀叹时光慵慢的繁多。我在想，弗洛伊德对人类心理本质精神的实际贡献，同时我也遗憾，遗憾那种理性甚至是缺乏本质对时空的看待。

如果像对伊德老夫那样对待时间的研究，会为人类解决多少难题，希望也会重重减轻正在恋爱中的我的苦恼。当然了，也为你，但条件是，你的心情和我一样。

好几天没听到你的声音了，理解我想你的心情吗？是因为你忙？没时间？还是忘了，远疏于我？

当然，所有的可能都是存在的。但我不敢多想，真的不敢。

那时我喜欢用长句子，显示思绪和文字的流畅。西藏是一个很宁静的地方，没有干扰，让人一下子看很远，想很远。

而此时，近乡情怯。积蓄已久的思念、爱恋、渴望竟然全部化作了不安和不自信：一年没见，这姑娘不会早被别人骗走了吧？

我订好了回程的机票，却特意地，没有告诉她时间。

飞机在首都机场落地，我便开始一路马不停蹄。

先回台里报到。和我的老领导坐同一个电梯上楼，他居然没认出我。我喊了好几声“吕主任”，他都只是看看我，礼节性地点点头。最后我怒了——在西藏学得很糙，大喝一声：“老吕！我是李咏！”

吾妻哈文（8）

他无比诧异，掉转头对着我上上下下打量，确认这个扎小辫儿、留络腮胡子的人真是李咏，上前几步搂着我，在我脸上摸了又摸，“孩子，瘦了。”眼里泛着泪光。

报完到，我赶紧去“四联”理发，又变回原来的小分头。然后回去洗澡、刮胡子，换上新衣服，新袜子，连脚趾甲都剪得干干净净。

穿戴一新，坐地铁到西单，在华威商场买了一枚蓝宝石戒指，花了我9个月的工资。又在一家花店买了99朵玫瑰，仔仔细细包好，庄严地捧在怀里。

接着，我赶到长途汽车站坐小巴直奔天津。为什么不坐火车？火车倒是便宜，太慢，我等不及啊。

车到天津，已是暮色四合。我捧着99朵玫瑰站在路边发傻。上次来是白天，有人接送，现在这黑灯瞎火的，哪儿是哪儿啊？

没办法，只好又打了一辆出租车，把我送到了天津电视台。

逡巡片刻，我来到哈文的宿舍门前。沉住气听了听，屋里没有声音。

我的心里，除了紧张还是紧张，竟然没有了半点“期待”。

我举起手，“当当当”，在门上轻轻敲了三下。没人理我。

“当当当”，又敲三下。

“谁呀？”哈文的声音，有点儿不耐烦。

我不吭声，继续敲门，“当当当”。

“谁呀？！”除了不耐烦，多了几分警惕。

我直到今天还依然记得，那一刻，我心中的忐忑。我怕啊，生怕她对着门外，喊出另一个男人的名字。不，别说名字，就算她兀自在屋里嗔怪地说上一句“真讨厌”，老子就能一脚把门踹开！

我还是不吭声，屏着一口气。“当当当。”

紧接着就听见咚咚咚咚一溜儿小跑。“吱扭”一声，门开了。

房间里没别人。

我看着她，她看着我。愣愣的。

她还是短发，比过去胖了点儿，脸上起了几个青春痘。我皮肤黝黑，两腮凹陷，衬得一双小眼儿炯炯有神。一年里瘦了4斤，倒是不多，但全瘦脸上了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相视半晌，我说。

流泪的不是我，而是她。她的泪水把我的心都化了。

这99朵玫瑰，此时可真多余啊。想拥抱她，都腾不出手。

进了屋，我们俩不太适应，一时无话。于是没话找话。

“今天忙吗？”我问。

“还行，采访王朝酒厂去了。”

说话间，我们都有点儿不好意思看对方的眼睛。

“哎，他们还送我瓶白葡萄酒，要不，开了吧？”她提议。

“行，开吧。”

面对面坐下来，我给她倒了一杯，也给自己倒了一杯，轻轻一碰，干掉。庆祝我们的重逢。

正是意醉情迷，可惜肾不争气，就在这节骨眼儿上，我突然一阵内急。可能是刚才太紧张了，没顾上往这儿想。我拔腿冲向楼道里的公共卫生间，飞流直下三尺，把这一年的孤独、委屈、牵念、不安，都彻底地放走了。

这时，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才“轰”地一下涌上脑门。

热恋中的情人，阔别一年，难道只是不痛不痒地聊聊天，喝杯酒？我想象过千百次的拥抱呢？亲吻呢？我要怎么样，才能表达我压抑了太久的爱和思念！干柴烈火啊！

您一定会想象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，此处省略1250字吗？不不不，太符合常理，就不叫故事了。

两分钟后，我走回房间门口，往屋里一看，傻了。哈文居然和衣倒在床上，睡着了，睡得还挺香。

我这才想起她不胜酒力，平时从来滴酒不沾。

我走到床边，俯下身，轻轻地吻了她的脸。然后独坐在桌旁，自斟自饮，饮尽了瓶中的酒。

吾妻哈文（9）

这，就是我们的爱情。

【老婆就像塑料花，永不凋谢】

很快，我们便迫不及待地结婚了，结婚的意思就是我们再也不想分开。

之前，我住在单位分的一间11平米的小屋里。墙上贴着各国国旗，各种尼泊尔的刀，各种银质项链，十分野性。

我有一张很高的单人铁床，我把四条床腿都锯掉一截。晚上，趁天黑没人看见，我溜出去偷木板，拿回来做成一个和铁床一样高、一样长的板凳，放在床边。最后买回一个大气垫，充好气往床上一放，床单一铺，咱也有双人席梦思啦！

西藏一年，我们的感情真被折磨苦了，心被揪得疼了。所以接下来，我们如胶似漆地腻了十年，方才觉出够。

到了第10个年头上，哈文主动提醒我，两个人过日子有些无聊，家里有些太清净，我是老李家的独子，总该有个后代云云。好家伙，这么一说，我责任就大了。那赶紧的，我现在就盖工厂，搭生产线，咱造人开始！

然后就有了我们的女儿。

结婚17年，我对哈文是越来越怕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到我安详地告别世界那一天，这都是件闹心事：这辈子我怕过谁啊？我跟我爸敢拍桌子，跟领导敢拍桌子。我没做什么亏心事儿啊，可我怎么就这么怕哈文?

凡事她不允许而我做了，比如喝酒，就得央求所有的目击证人替我保密，替我保密，替我保密。我怕她。

只要她一瞪眼，一生气，我顿时就像老鼠见了猫，把自己缩到最小，或者干脆消失。我怕她。

我给她起了个名字，叫“劈头士”——劈头盖脸谩骂的人士。她的经典句式是：“你若是我儿子，我一天不知要打你多少顿！”她一“劈头士”，我马上噤若寒蝉，绝不顶嘴。我怕她。

一百次争吵，一百次是我认错。我怕她。

我们俩有个原则，“矛盾不过夜，过夜就是仇。”有什么想法，咱今日事今日毕，甭管多晚，坐在一起说明白了。实在有原因不能拉晚儿，那我先认错：“我错了，行不？这事儿就算结了。不许记仇啊。”她必须答应我不记仇，否则不许睡。

不是我的错，我认。是我的错，我更得认，我的风格就是不打自招。

男人向自己心爱的女人认错是一种美德。我还给自己的美德想了个寓意深远的说法：成熟的稻子总弯腰，我弯腰，因为我成熟。

我已经想了很久。到底，我怕她什么？我反抗一回又能怎样？

思来想去，我决定放弃一切有关揭竿起义的想法。因为我在意她的感受，我起义，她难受，我更难受。她“劈头士”，她痛快，我也痛快。

我怕她，是因为我爱她。

我问朋友：“你把自己的老婆比作什么花？”怎么说的都有。

“玫瑰。”

“红玫瑰。”

“百合。”

“麝香百合。”

我慢悠悠地说出我的答案：“我的老婆，我把她比作塑料花。”闻者皆惊。

“塑料花，很普通，但永不凋谢，摆哪儿是哪儿。”我解释道。

科学家深入分析人类荷尔蒙，得出一个令人失望的定律：所谓“爱情”，保鲜期不超过36个月。或许不少人都亲自验证了这一说法。

但是对我来讲，爱情是无限期的，就像塑料花的花期一样永恒。

什么是爱情呢？火热，缠绵，昼思夜想……这固然必不可少，但只是一个阶段。待到年深日久，婚姻除了油盐柴米，总还要有点儿情感的维系。

通俗点儿讲，夫妻一开始之所以结为夫妻，都是因为彼此相爱。有点儿像做买卖，头一次合作成功，纯粹自愿、双赢。但咱不是做一桩买卖就完，还得长期合作，而且不一定老能赚钱。即使不赚钱，关系也得维持着，为下一次赚钱做准备。这就是经营。

吾妻哈文（10）

婚姻怎么经营？每个人都有一套理论。

有人过腻了，去外面的世界寻求安慰；有人心大胆小，只好成天在家找茬挑事，怨天尤人；还有人，深谙生活不过如此，没头苍蝇似的乱撞，不如认准这一条路走下去。那咱就修路吧，有什么沟沟坎坎，咱一块儿把它填平了，有什么陈年积怨，咱心平气和把它化解了。

窃以为，上述三者，以后者为上上策。不谦虚地说一句，在下即是。

除了经营，我再作一增补：婚姻还要积蓄。积蓄的不是钱，而是每一天，两个人之间一点一滴的关怀。谁家都有急着用钱的时候，怕就怕钱到用时方恨少。两个人的感情也一样，每天攒一点儿，关键是攒多了还有利息呢。将来无论遇到什么事，让人生气的，产生误解的，你们首先念起的，却都是对方的好。

别见怪，我说什么都爱往钱那儿联想，您还不得不承认我言之有理。

我和哈文一直过得很有意思。有时候我们躺在双人浴缸里，我捋着我的长发，她揪着她的短发。

“看咱俩这样儿，到底谁男谁女啊？”她说。

“是啊，我也纳闷儿呢，咱俩什么关系？夫妻？情人？哥们儿？同事？朋友？好像都有点儿。”

结婚17年，我对婚姻的定义是“像雾像雨又像花”。激情似火的日子当然已经走远。剩下的是一种亲情，一种相互的牵挂和寄托。我以为，这就是最深的爱了，深到无以形容。

我们经常会给对方一些惊喜。当然了，她掌握着家里的经济命脉，我连银行卡密码都不知道，这无形中增加了我制造惊喜的难度。

去年，在她生日之前，我犯了个大错误：酒喝高了，大醉酩酊，当众散尽了德行。我看人都是重影，来了认识的，必须跟我连干三杯，不认识的，就让人家“滚蛋”。倍儿高档的酒杯，被我可劲儿往地上砸，那可是要赔钱的。

酒醒以后，我自称“断篇儿了”，发生了什么一概不知。当然，单听旁人描述，我也自知其罪当诛。把哈文气得呀，几天都不跟我说话，一看就是憋着火呢。千万别惹她，一碰就炸。

谁让我借酒装疯呢？哈文这股子气如果不及时疏导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道歉。

怎么个道歉法？语言是苍白的，行动是有力的。我溜到商场里给她买了一只钻戒和一副耳钉。既是生日礼物，又能冰释前嫌，一物二用，相当于打五折！

当然了，如我所料，因为支出达到了一定限额，立刻被她察觉到了。

那天她回家挺早，一进门，黑着脸。我立刻躬腰垂首迎上前去，浑身上下都赔着小心，听候发落。

“你动账上的钱了？”

“我……啊对，我动了。”

“干吗去了？”

“我能不能过几天再解释？”我故意给她撮火儿。此时越是盛怒，彼时才能越觉得对不住我。怕啥？东西在，底气足。

果然，她上套了，劈头盖脸谩骂道：“少废话，现在就说！”

我装出万般委屈的样子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精致的首饰盒。“本来想等你生日那天再告诉你。”说着，把盒子打开给她看。

哈文当时愣住了，看了看首饰盒，又看看我，脸上浮现出一个不易察觉的虚荣的微笑。嘴上却依然不让步，“什么意思啊？想买通我？告诉你啊，别以为这么就能蒙混过关，检查写好了没有！”

“写，写，我今晚就写。这个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老婆，你大人不记小人过啊，原谅我吧。”我眉眼笑作一堆地看着她，心想哼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你不给我面子，还能不给它面子?

吾妻哈文（11）

往俗了说，女人都喜欢钻石。往雅了讲，是钻石还是玻璃并不要紧，要紧的是我的这份心。我觉得我是个当之无愧的好老公。我挣的钱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你，主动放弃银行卡密码知情权，好不容易偷偷支点儿出来，还是为了哄你开心。只要我没做违法乱纪对不起婚姻的事儿，你不原谅我都说不过去。

今年我又如法炮制，送给她一块非常心仪的限量版千禧表，作为生日礼物。她心情和谐，我们全家都和谐。

您该说了，这事儿做得挺刻意的，有劲吗？我告诉您，有劲，不信您就试试！

俗话说得好，家业家业，有家才有业。您听说过“业家”吗？那是姓叶的他家。

所以我很恋家，家庭高于一切。

我的朋友，哈文都认识。她的朋友，我也都知道。我们俩就这么透明。有人说，即使是两口子，心里也得有块自留地，我们不弄这个。你把整个后半生都交给她了，她是你的遗产第一继承人，还保留啥呀？带到骨灰盒里去？

所以我们之间沟通特别直白。

“哈文，你瞧那女孩儿，多温柔，你要是像她一样就好了。”

有时候她会因为我措辞过于直接而伤自尊，继而“劈头士”，或者也跟我来这套，专门针对我脸长、腿短等生理缺陷进行人身攻击。但其实我们心里都挺明白，越是直白，越是在乎。

这些年，所谓美女，我见过太多太多。我曾经在心里拿她们跟哈文做过类比，都比她漂亮。但是只要一回家，一见到哈文，我就由衷地发现：我老婆咋这么好看？可见老婆美不美，其实不是视觉问题，而是心理作用。

很多人说，孩子是婚姻的第三者，所以我们抵制了10年。但事实上，我发现女儿的出生并不能冲淡我们之间的情感维系。现在我们是三个人，彼此相爱，不分孰重孰轻。

有时候我犯了错误，哈文使劲儿戳我脑门儿，“你呀你呀，你跟女儿就像我的两个孩子！”令我自尊心备受打击。但内心深处，我又是充满感激的。一个女人，能把我当成孩子来爱，我还奢求什么？唯有想靠近。

在她面前我是个挺调皮的坏小子，经常穿得花花绿绿晃到她办公室里去。

她一抬头，“哟嗬，今儿用的什么香水？”

组里同事都知道，李咏来了有两个标志，一是楼道里弥漫着香水味儿，二是哈文办公室里传来她肆无忌惮的笑声。

“管着么？”说着，我又得意洋洋地晃出去。

但吊儿郎当之外，我首先是个好老公。当老婆和女儿起了冲突，我护着老婆，训孩子。这中间当然有“红脸白脸”的策略，但也有一个很根本的想法。女儿还小，她还会有很多人生的体验，受点儿委屈算什么？应该叫“挫折教育”！可老婆就一个，跟我20年了，委屈谁，也不能委屈她呀。

有一次我和哈文在外面吃饭，直接就冲过一个女的来坐我对面，情深款款道：“你还爱我吗？你抛弃我了？”有道是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第一反应就是“快叫保安！”

我就是要做给我老婆看，你放心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而我们之间当然也有着百分之百的信任。当年我们租房子住的时候，邻居只要看见哈文买一摞匹萨饼回来，就知道她又要出差了。因为我是一个宅男，我可以连续一个月不出家门，因为老不出门，我的跑车电瓶都放坏了。

我们也有七年之痒吗？

结婚七年，我们聊起了这个话题。然后背过身，一人写一个小纸条，数“一、二、三”，同时亮出答案。

吾妻哈文（12）

答案一模一样：“痒。”

既然痒，该怎么挠？我们俩分头行动，各自挠各自的，行不行？行。而且有的是机会。那么爱情不再维系，我们的相爱只是空白一场。这样的结局，我们不愿意。

我们商量出一个止痒的方案：各自买套新睡衣，天麻黑的时候把商标剪了换上，溜上床，背靠背一躺。我就当身后躺的是别人家老婆，虽然回手一摸，跟我老婆一样胖。咱精神上过回瘾，行吗？

只是我正闭目陶醉于无边遐想，耳边突然传来“劈头士”的怒喝：“走什么神儿呢？是不是又想哈文呢？不许想！”

我属于出国旅游不用调时差的那种人，作息诡异，昼伏夜出。所以，和老婆经常见不着面。她睡了，我还在工作，我睡了，她该起床上班了。

于是我们养成了互相留条的习惯。

一天夜里，我为了一桩工作的事儿头疼，溜达出来逃避一下。路过卧室，听见一阵甜蜜的鼾声，伸头一看，哈文睡得这叫香。给我羡慕得啊，当即提笔赋诗两句：“屋内自有被窝热，屋外奋笔疾书苦。”又附一行小字：请将表对至12点。

这是让她起床以后帮我调闹钟，免得我一觉睡到天黑。我自己不是不能调，但是多少年来习惯了，不信闹钟信老婆，不信自己信老婆。去外地出差，酒店叫早服务我都信不过，永远把手机放在枕边，老婆电话来了，我就该起了。

中午起床，发现还是那张纸上，哈文给我来了两句回赠：“床上自有逍遥客，班中却是忙碌人。”那意思是现在您消停了，我出去挣钱，您还有啥不平衡的？

我欣赏着她的小“狗爬字”，心想，我老婆真是很有情趣啊，这日子过的，真美。

一天， 我们俩在家翻箱倒柜，找从前那些旧书信，还翻出这样一张纸条：

亲爱的老婆，早上好！

要知道你今天对我说的两句话，“几点回家？汤放在微波炉里怕你看不着。”对于一个已经“功成名就”的年过而立的不耐烦的男人来说，起什么作用？告诉你，就像是酒鬼见到了酒，馋猫遇到了腥。两个字“受用”。

虽然我只淡淡说了声，早点睡吧。但是泪花已在我眼眶内涌动，只可惜你没看到，睡着了。

有了疼我的老婆，有了爱我的女儿，有份腾达的事业，对我这样一个心态极度虚荣的男人是何等重要。是，我虚荣，虚荣曾让我犯过错，也让我坐享成功。今天我的这颗虚荣的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，如果这种感受可以持续，我愿意虚荣一辈子。

写下这两段话，丝毫没有做作，也不是在煽情，只是我的真实感受。为了这份真实的感受我吃了两只蟹，喝光了一碗汤，还灌下了两瓶朗姆预调酒。如果你觉得此信特别，就当是我的求爱好了。真的，老婆，我爱你！

我庆幸，我们还保留着这么多生活的痕迹，即使在最平淡的日子里，仍能想起这么多美好的瞬间。

还记得那天，我工作到深夜，到家已是凌晨，看到她的留言心里热乎乎的。走进卧室，看见她已经睡着了，轻轻打着鼾。我坐在床边摇了摇她，想跟她说说话，她迷迷糊糊不肯醒来，“别闹，我困着呢。”

“好好好，睡吧，睡吧。”我轻手轻脚退出去，关好房门。怀着深深的幸福感，一番大快朵颐，喝高了，最后写下了那张字条。

不怕您见笑，我作了一首打油诗，与各位像我一样准备“一条道走到黑”的中年人士共勉：

姻缘实难得，修路好处多。

爱情须保鲜，自备保鲜膜。

李氏父子（1）

我爹是我最忠实的观众。他永远默默地在电视报上划出所有我的节目，到点儿必看，不管重播多少次。烦人的是他光自己看还不行，非拉着我娘一块儿看，一遍都不能落下。

我爹今年快80了，生活规律，身体健康。每天下午5点打开收音机，躺床上听点儿小道消息，吃完晚饭，按时收看《新闻联播》。除了这点儿事，就是担心我，仨孩子里就我爱兴风作浪。

每当听说有关我的负面消息，他就很恼火，跟我辩是辩非。不管我怎么解释，我爹都是这一句："你怎么就这么不省心？怎么就不能向人家罗京学习学习！"

【有父如是】

我出生之前，我爹已经有两个闺女了。我娘遵照党的方针指引，没日没夜地搞"社教"。正事儿也没几件，就是一群老娘儿们咋咋呼呼。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相互嘀咕：闲着也是闲着，生个孩子得了！

于是妇女们不顾老公的劳累，开始了下一代的"制造"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娘有一天告诉我爹："咱有了。"

我娘有个朋友，是妇产科大夫，做完检查，高兴地告诉我娘："是个儿子！"

算起来，大姐比我大8岁，二姐比我大6岁。我爹我娘根本没征求我意见，就这么把我造了出来。

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医生把我从产房里抱出来，跟我爹照了个面，我爹喜极而泣。

他一溜烟儿就跑到了大街上，干吗？给我娘买礼物。今天她立了头功！

东街走西街，不知道买什么好，最后买回来一个肥皂盒。

20年后说起这一段，我娘还在笑我爹"不靠谱"。

我爹一生满怀未竟的理想，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，从形式到内容都精益求精。比如他让我从小头顶“三七开”，打头油，头缝细而笔直，发丝服服帖帖。我们站一块儿，就是电影《包氏父子》里那爷儿俩。马褂、怀表、小分头——在他心目中这是文化人的范儿。

还有一些观念，完全不合常理。我七岁那年，有一天肚子疼，疼了一宿，满身大汗。我爹果断地说：“送医院！”我被扛到医院，送进病房，检查结果是“急性阑尾炎”，要立刻切除。换上病号服推进手术室，也不知为什么，突然就不疼了，我脱了蓝条褂儿直接溜回了家。

回家以后我爹开始给我讲道理，说这个阑尾啊，得割。有本书上写的，在英国，凡是贵族家庭，讲究点儿的，小孩儿都割阑尾，更别说我这还是个发炎的阑尾。

我当时小，没跟他争，后来懂点儿事了，才又提出来跟他讨论：阑尾它招谁惹谁了？父精母血，人身上哪个零件没用？再说了，咱又不是贵族，管人家贵族什么样呢。

我爹曾经跟我说：“小咏，我给你讲讲我小时候吧。”我当时正忙着呢，回了一句：“没心思。”他就没讲下去。

我只知道我爹年轻的时候在兰州一家中药店当过学徒，表现不错，19岁那年被派到上海进修，见了不少世面。再回兰州，就感觉呆不下去了，第二年又来到上海，投奔一位堂兄。堂兄在位于南京东路的“达仁堂药房”工作，给我爹也谋了份差使——坐在药房里的高台子上，抄方子，记账。

我爹在那里练出一手好字，药堂里一直保存着他写的笔记，直到几年前被拆迁。后来我上了大学，我爹要求我给他写信时，也一律用竖排繁体，导致我直到今天也不大会横着写字，怕弄错行。

1951年秋天，我爹离开上海，报考了兰州铁道学校，专业是会计。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娘（真老土），我娘小他7岁，当时念的是兰州师范学校。两个年轻人相爱，顺理成章地结了婚。

李氏父子（2）

我爹毕业以后，响应号召，分到乌鲁木齐铁路局工作，任党委秘书，属于核心部门成员。1952年“兰新铁路”动工，他也随指挥部一起，跟着铁路向新疆挺进。我娘和其他家属先迁到了乌鲁木齐。

刚到那儿，我娘闲得没抓没挠，就报考了乌鲁木齐第一女子师范学校，后来当了地方上一所小学的老师，语文、数学、体育都教，还是她所在地区的女子篮球队教练。从学科安排上，您就能看出当时的教育资源多么匮乏，同时看出我娘有多能干，说起来也是“双学位”。

1958年，兰新铁路经达坂城穿过天山，修到了乌鲁木齐市，我爹我娘终于团聚了。我爹属羊，我娘属虎，这一羊一虎，凑一块儿过得还挺美。我娘贤惠，家里家外都打点得好。爹的生日是在10月，他常喜滋滋地说：“我这个羊好，秋后的羊，有草吃！”

我爹胃不好，对吃的东西很挑剔。还好，当时我们家条件还过得去。饭、菜端上来，他觉得喜欢就吃，要是不喜欢，“啪”，筷子往桌上一拍，走了。我娘就得去厨房重做。

儿时记忆里，我爹是个“夜猫子”，今天的我也成为夜行动物，或许是他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半夜醒来，总看见他的书房亮着灯，没完没了地誊写稿件。近几十年，《新疆年鉴》中铁路发展史的部分，全部是他的署名。

纸篓里写废了的稿纸都只有一两行。只要错一个字，我爹就撕了重写，而且撕得整整齐齐。这副“轴”劲儿，如今完完全全地遗传给了我。每当看到我坐在沙发上，把一张废纸整整齐齐撕成二分之一、四分之一、八分之一……整整齐齐落好，再撕下一张，哈文就大呼有病，十分不解。

我爹喜欢养花，在阳台上养了几株茉莉，有成年人的手臂那么粗。一种花开单层，香气袭人；一种是双层的，好看，但气味很淡。

每逢花期，我家的茉莉开一茬便有600余朵——我爹一朵朵地数过。这一茬谢了，下一茬又接上。

茉莉花开时，家里总是高朋满座，我爹的书法家朋友、画家朋友全来了，不喝茶，只泡花，趁着兴起，挥毫泼墨。

泡不完的，我娘怕浪费，就采下来晒干。先把茶叶筒里的茶叶倒出来，又一层茶叶一层花的铺进去，下一年随时可以泡来喝，怡神醒脑。

花是我爹的心头肉，只要谁说一个方法能让花长得好，他一定要试一试，比如用臭鸡蛋水给花施肥，屋里臭得都呆不住。花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我爹能伤心好一阵子。

有一回我们搬家，那时候也没有搬家公司，就是请几位朋友帮忙，然后招待人家吃顿饭。我爹养的一盆米兰被放在了大衣柜后面，谁都没想起来。过了好几天了，我爹才想起米兰上哪儿去了？左找没有，右找没有，最后才从柜子后面找出来，已经枯死了，新疆气候太干。我爹当时就震怒了，又不知道这气该对谁撒，一巴掌推倒了大衣柜，摔得四分五裂。

【“老疙瘩”给宠坏了】

我爹骨子里追求“儒士之风”，但这一点似乎没有写进我的基因密码。作为家中独子，我很受宠，要月亮不能摘星星。两岁以前，我几乎脚不沾地，俩姐姐轮流背着抱着。再加上遗传了爹的倔和轴，从小乖张跋扈，蛮不讲理，一切享受都是理所应当。

之前，爹娘不以为意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老疙瘩，能宠则宠吧。我爹突然发现儿子管不了了，是在我4岁那年。

李氏父子（3）

那天家里来了很多客人，围坐在客厅里聊天。我在街上玩儿，突然想撒尿。我有洁癖，从不在外面上厕所，所以一直憋回家。进门一看，卫生间有人，真烦。当时我急啊，顾不得那许多，直奔沙发旁边的痰盂，掀开盖子就来了一下，完事儿提上裤子就走，周围的客人根本甩也不甩。

又出去疯玩儿了俩小时，再回家时，客人们都走了。客厅里只剩下我爹一个人，铁青着脸坐在沙发上，煞是吓人。痰盂敞着盖儿，就摆在他脚边。

见我回来，我爹指着痰盂儿，一字一顿说："给我盖上。"

我自知惹祸了，但又死犟，站着不吭声，还一脸大义凛然。

"给我盖上。"这几个字是从紧咬的牙缝里挤出来的。

"凭什么盖啊！谁让他们占厕所的，讨厌！"我佯装无畏，其实心虚。

"你简直毫无廉耻！我再说最后一遍，给我盖上。"

"不盖！"

"盖不盖？"他站起来，向我走近一步，揪住了我的耳朵。

"不盖！"

"你再说一遍？"我爹下手真狠，不但拧，还往上提。

"不盖！"

"再说？"

"不……"

据我娘形容，我被提溜得马上就要两脚离地了。她见势不好，急忙一路小跑过来，躬身拿起盖子，"砰"，把痰盂盖上了。"有话好好说不行？就知道揪孩子耳朵！"

我爹从来不打我，怕打坏了，就这么个老儿子。揪耳朵是他对我最狠的惩罚，可又常常不奏效，因为我吃软不吃硬。这也是他惯的。

高中三年，我叛逆到了极点，跟我爹完全无法对话，横竖不对付，张嘴就是吵。那时候两个姐姐都已经长大成人，我娘的精力除了忙工作，就是用来调节我们父子关系。

能吵到什么地步？除了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还得是我娘在场，其余时间我娘不敢让我们爷儿俩单独碰面。就说吃饭，我妈炒好一盘菜端上桌，招呼我们开饭，然后就得赶紧地去炒另一盘菜。爷儿俩脸对脸的时间超过3分钟，就得拍桌子瞪眼。

现在想想，为什么啊？我也说不清楚了。直到我自己也当了爹，才觉得挺对不住我爹。当年他激动得满大街买肥皂盒的时候，怎么也没想到儿子是个讨债鬼，老天专门派来和他作对的。

高三毕业，我考上北京广播学院，我爹不放心我一个人出远门，就借口说要去北京开会，和我一起登上了70次列车。

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新疆，甚至连天池和吐鲁番也没有去过。我趴在窗户边上看了一天一夜没合眼。窗外总是茫茫戈壁，延绵无际的沙丘。我的内心同样如是，似乎什么也没想，却又总也不能平静。

终于离开新疆了。过去的三年，我每天都在觊觎“外面的世界”。我正青春，我很叛逆。一点点大的商场，一点点大的邮局，一点点大的饭馆，一点点大的学校，我早受够了。我甚至收拾好一个旅行袋，塞在床底下。每天都研究地图，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，我就启程。

火车轰隆隆一路向前，窗外的风景一成不变，诠释着国家的地大物博和地广人稀。我手里拿着地图，不断地向远方看，找下一站在哪儿。最羡慕的就是途经的小站上孤独的摇灯人，一个人，浪漫无拘。我很庆幸，自己从此要去见识广阔的新世界，更庆幸的是之前并没有背上行囊孤注一掷，否则流浪到了大戈壁，能不能活着回去都是个问号了。

“看看看，看了一路还没看够，有什么可看的？”爹吃着泡面，很不耐烦。他特烦我装深沉。

李氏父子（4）

“我就觉得好看，你看不惯就自己睡觉呗。”我翻着白眼说。

又来了。我们俩当时都挺习惯这种对话方式，说什么都带着股火药味。

从乌鲁木齐到北京，3774公里，经过三天三夜，车到北京，正是晚上。我们从北京站打了辆人力车奔东单，住在中国铁道出版社招待所，社长是我爹的好朋友。安顿下来，马上打电话给娘报平安。我娘千叮咛万嘱咐就这一件事：你俩千万别斗嘴。

挂上电话，我爹要带我出去逛逛，看看天安门。出门碰上个煎饼摊，北京特色，1块钱一个。我爹说，咱尝尝。又特别嘱咐那小伙子：“给我儿子摊俩，纯鸡蛋的，不放面。”

半大小子，吃死老子。俩人仨煎饼，一共花了5块钱。

啃着煎饼果子，我们一路溜达着奔天安门广场。过去只在课本里见过天安门城楼，如今终于见着真的了。长安街两旁的便道上铺的都是各种花色的小方砖，这挺新鲜，原来没见过。我手捧煎饼，踩着小方砖“啪啪地”往前蹦。一边蹦就一边发上了感慨：“爸，你看我将来毕业了，有没有可能留北京？”

我只是随口一说，我爹却很不满意，“你想什么呢？给我踏踏实实的，先把书念好！再说了，要留就留上海，那才叫大城市！”言语中满是一个“上海人”对北京的不屑。

我不服气，又扯东扯西地跟他争执一番。这叫啥事儿啊？还没去学校报到呢，先为毕业以后的事儿吵上了。吵完了心里都不痛快，一直到睡觉，再也无话。

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，偷偷溜出门，干吗？革命从头开始！

留了十几年“包氏父子”的小分头，腻歪了。我跑到位于金鱼胡同33号的四联理发馆——这是头天晚上偷偷向服务员打听来的，剃了个当时最流行的高仓健的板寸。

顶着板寸回到招待所，进屋时我爹刚起，坐在床边上，看见儿子变了个人回来，惊得瞠目结舌。

他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半晌只眨眼不说话，待到回过神儿来，直接扑向电话机，拿起话筒“哗哗”拨号。

“喂？喂！”简直气急败坏。

“大早上的，又怎么啦？”那边儿传来我娘的声音。

“你知道你儿子干了什么吗？”我爹咬牙切齿，像仇视阶级敌人一样仇视着我，“你儿子，剃了个平头！！！”

不等他告完状我就嚷嚷开了：“剃平头怎么了？我不爱留分头，每天梳来梳去的耽误工夫！我想利索点儿，我想腾出时间好好学习，不行啊？”

于是乎我娘劝了这头劝那头，爷儿俩轮番接电话，做了半小时工作，这事儿才算勉强收尾。

干完一仗，正事还不能耽误。我爹带我上街，买齐了所有上学要用的家伙事儿，不锈钢餐具、脸盆牙刷、毛巾肥皂……挑的都是好的，贵的。但是余怒未消，一路无话。我也挺憋屈，不就理个发吗？这也犯得上动肝火？

东西买回来后，装在我姐结婚时置办的大箱子里，我爹帮我拖着，坐上312路公共汽车。在车上晃啊晃的，爷儿俩各看各的风景，各想各的心事。

汽车到站，正好停在广院正门。我们从校门进去，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地址找到7号宿舍楼。我爹怕我拿不动行李，弯腰一铆劲儿，自己把箱子扛起来直接上了二楼。我跟在他后面，想搭把手，犹豫了犹豫，没开口。

进了房间，我爹向宿舍里的同学一一打招呼，“他叫李咏，第一次来北京，请你们多关照。”

吵了这一路，终于到地方了。我也一下子挺直了腰杆，扬眉吐气，跟同学谈笑风生起来。我故意不理我爹。瞧见了吧？这一屋子都

是板寸，就您一个分头！

李氏父子（5）

我爹见我和大家挺融洽，放下心来。“那我走了。”

“行行，您走吧，赶紧走。”可算解放了，我推着他向外走。

我把我爹送到楼下，连楼门都没出，“爸您快走吧，走吧走吧！”

我爹也对我说：“回去吧，回去吧。”

一边说，一边独自朝校门的方向走去。走两步又回头，朝我摆摆手，示意我回去。我也不含糊，拼命朝他摆手，恨不得让他赶紧消失。

我爹终于走远了，我特高兴，连蹦带跳回到了宿舍里。

后来，当我在大学校园里给爹娘写第一封家信，回想起这一天，回想起爹的背影，我哭了。那封带着泪痕的信至今还保留着。我爹把我所有的信，都一页一页粘在白纸上，装订得整整齐齐。

又过了很多年，我做了电视导演。一天，正在编片子，剪一个“慢动作”，我爹的背影又突然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我眼前——

他很瘦，一个人慢慢向前走，心里想着儿子的未来，也可能是儿子的过去。一阵风吹来，他的衣服扑簌簌地抖，显得那么孤独……

我的眼泪再次“哗”地冲出眼眶。

19岁的我，怎么那么没心没肺？怎么那么混蛋轻狂？我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、甚至得意忘形！是故意气他吗？自以为满腹委屈，其实我根本就是个不良少年！

我爹是很好的一个人，这是我现在的感觉。

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少年都无法绕开这段经历，冲撞到和解，叛逆到回归。为那个背影，我将愧疚一辈子。

大一暑假，爹娘早早做好准备迎接儿子。我从火车站坐车回家，一进门，桌上饭菜都摆好了。我娘招呼我赶紧放下东西，洗了手坐下。

我爹开了一瓶啤酒，倒满一杯，放在我面前。

“儿子，以前我不让你喝酒，今天你可以喝，因为你长大了。”

那顿饭我没吃下去，哭得一塌糊涂。

【“你向人家罗京学习学习！”】

大学毕业那年，走了狗屎运，误打误撞进了中央电视台，还是唯一一个播音员名额。这在北京都是件挺大的事，别说在老家了。消息传到边疆，当即轰动，亲朋邻里都知道“老李家的儿子进中央了”。

几年以后，再踩一脚狗屎，《幸运52》使我一夜成名。家里摆上了流水席，有的朝贺道喜，有的申请救济，再有就是过去没平反的也来申冤，“托你儿子向中央说说情。”全国各地的记者采访完李咏还得采访李咏的爹娘：“请问您是怎么把儿子培养成才的？”

弄得我爹娘是又高兴又烦恼。高兴的是活这么大岁数没接受过记者采访，烦恼的是也没怎么用心栽培过我，只好编一些理论来应对，每回采访完都赶紧打电话问我：“这样说合适不合适？”

总之，鸡窝里飞出金凤凰，老公鸡老母鸡都待不住了，闹心。

我岳父岳母去世早，只看到我们结婚，却没等到外孙女出世，更没享到我们的福，这是我最大的遗憾。所以我和哈文商量了一下，把我爹娘接到北京，好好孝敬他们。

爹娘在新疆清净惯了，和我们一起过，嫌吵。于是我给他们单独买了一套房子，离我家不远，隔三差五就去看看。

我爹身体挺好，但我娘患上了严重的心衰，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一家几乎不可能一起长途旅行。我为他们请了很负责任的保健医生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主动打电话，提醒他们该换药了，该检查了。我还和小区保安混成了哥们儿，每天早上，他们开电瓶车接我爹去买菜，或者知道老两口缺什么了，就帮忙捎回来。

李氏父子（6）

只要对爹娘好的，我都愿意用我这张“熟脸”去换。

看望爹娘时我们一定是带上女儿的。赶上我工作忙，就派哈文和女儿做代表，给他们送些生活用品和零花钱。我们相信身教胜过言传。

一家人里，我爹是我最忠实的观众。他永远默默地在电视报上划出所有我的节目，到点儿必看，不管重播多少次。

据我娘描述，每次我爹看我节目，一边嘴角都挂着一丝笑。请注意，只有一边哦，那是他打心眼儿里在得意。烦人的是他光自己看还不行，非拉着我娘一块儿看，一遍都不能落下。

小区里常有邻居问起我爹，李咏是你儿子啊？我娘说：“就你爸那个表情，我都没法儿形容。”每言及此，我娘总是怒其不争，“一点儿没城府！人家跟你客气客气，你还当真了！”

老人很少向我们提什么要求。我爹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：“出差住酒店，遇上好的木梳，给我带两个回来。”他到现在还保持着“包氏父子”的分头，白发苍苍，一丝不乱，喜欢齿密的木梳。

但从另一个角度讲，他对我又要求甚高，相比从前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那阵子我膨胀得厉害，出门必戴墨镜，牛X哄哄，觉得自己挺大腕儿。路上有人招呼我，我也一副爱搭不理的德行。

一次，我带爹娘去饭店吃饭。刚刚落座，我爹环顾四下无人，小声但很严厉地说：“有时候，我看见你的那个表情，比较讨厌！”

“什么表情？”我摘下墨镜，感到莫名其妙。

“你小子还装！刚一进饭店大门，你那表情就不对了，很烦人，知道吗？”

我依然作丈二状，“我怎么烦人了？”

“原来你可不是这样!人家跟你打招呼，你都笑脸相迎。现在倒好，成天不出门，出门就是一副屌屌的样子。你呀，不能忘本，要知道今天所有这一切是谁给你的。再这么得意洋洋，别人会不喜欢你的。”

话说到如此地步，我只能放弃狡辩。老人家神目如电。我那点儿小心思，给他看得透透的。

“你以为人家跟你打招呼是恭维你？告诉你，那是人家看得起你。”

假如倒退10年，我们爷儿俩又得干上一仗。但那回，我爹的话，我是真听进去了。生活教会我服从真理。

打那以后，我时刻提醒自己，既然自诩平民主持人，就得有平民的样儿。

出门在外，观众找我签名、合影，我能配合都配合。

开车上路，旁边并行的司机按喇叭招呼我，我也冲他按两声喇叭。

最有意思的是在大马路上开车，有的汽车从我身边“呼”一下超过去，看到是我，又放慢速度，摇下车窗等着我，“咏哥你好！”我指定笑眯眯向他敬个礼，“您注意安全！”

估计我这些小变化，我爹都看在眼里，但他不说，因为火候未到，怕我骄傲自满。直到去年，我带爹娘去三亚度假，在酒店里对服务员左一个谢谢，右一个谢谢，我爹才对我稍事表扬：“有点儿改进，但还不够。”

刚得点儿表扬我又造次了。前些日子《咏乐汇》请王刚老师来做嘉宾，我们俩借着酒劲儿，逗了两句闷子，我爹看了很不满意，“你怎么能叫人家老王呢？人家是你的前辈。凡是比你有经验的，有阅历的，都要叫老师，特别是同行！”

我连连点头称是：“好，我下次记住了。”

我爹今年快80了，生活规律，身体健康。每天下午5点打开收音机，躺床上听点儿小道消息，吃完晚饭，按时收看《新闻联播》。除了这点儿事，就是担心我，仨孩子里就我爱兴风作浪。

每当听说有关我的负面消息，什么“懒汉门”、“女装门”、“下课门”……他就很恼火，打电话向我求证，跟我辩是辩非。不管我怎么解释：“别听他们瞎扯，我好好儿的！”我爹都是这一句：“你怎么就这么不让我省心？你看人家罗京，多稳重！”

哎，如今我是消停多了。我真不希望爹娘到了这个岁数，还为我担惊受怕。

头天在电话里解释清楚，第二天还得去当面表态。打一进门我这张嘴就不闲着，从天上扯到地下，一家人笑声不断，我爹也被逗得前仰后合，“看来你小子是真没事儿。”

不过哈哈大笑完毕，爸爸还是那句结语：“你怎么老这么不正经？向人家罗京学习学习！”

我爹的话，不上心还不行。

因“血统”而夭折的画家（1）

【“这孩子胆儿真大！”】

我是一个夭折的画家。

小时候，我在一家很简陋的俱乐部里，看了场5分钱的电影，秦腔古典名剧《三滴血》。回家以后就睡不着了，满脑子都是电影里的乌纱帽和官袍，趴在桌上用圆珠笔画。

我就不明白，那些穿官袍的人为什么老托着腰带？是不是一松手就掉下去？乌纱帽两边为什么支楞一对翅膀？晃来晃去还不够晕的？之后又不断地回忆官袍上的图案，文官绣禽，武官绣兽，官品不同，所绣禽兽也尊卑不一，仙鹤孔雀狮子虎豹……琢磨来琢磨去，如醉如痴。

那是我第一次对画画产生兴趣，不到四岁半。

我的启蒙老师是爸爸的一个朋友，在铁路系统搞宣传工作，会画几笔人物花鸟。俗话说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他就是领我进门的师傅。我们其实只见过一面，他什么也没教我，只领我看了他的画，当时的感觉，就是眼花缭乱。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开始。

我开始自学素描，它是一切艺术的基础。我第一次知道铅笔居然有软、硬之分，以此为标准，能分成13种之多。我首先接触到的是苏里科夫素描体系，搞不懂它的理念，只是拿起笔找感觉。没完没了地练习笔法、力度分寸，临摹、写生，各种几何形体的石膏像和自然风景，轮廓、线条、结构、光影……客观与主观的世界在我笔下交融，仿佛突然练就了造物神功，无所不能。

除了上学、吃饭、睡觉，我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画画，爹娘很发愁。那个年代，都希望孩子能“学习好”，其他方面，过得去就行。但他们仍然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。我娘管理着一家印刷厂，各种纸张有求必应；我爹请人给我做了大大小小好几个画夹，里面是木板，外面用军布包起来，粘好，两边钉上背带。

我小小年纪，对自己的要求却极为严苛，近乎强迫。原因说不清道不明，就是喜欢画画，画不惊人死不休。

上中学以后，我认识了一位姓戴的美术老师。他那时单身，常年住在学校，在画室里一呆就是一整天。每周末我都去看他写生，他画的是油画。从他那里，我学会了用湖蓝色给画打底，湖蓝和一切颜色都是可以相融的。

初一一年，我画了厚厚一本习作。其中大半作品是临摹以毕加索为代表的“立体派”，就是看上去支离破碎、扭曲变形的那种。我对画派不太理解，但我崇拜毕加索。习作中还有小部分是人体。当然没有模特愿意脱了衣服让我画，都是石膏像写生。

我姐夫是哈密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。为了讨好我娘，把我接到哈密去读了两年初中，美其名曰“补习英语”，跟他一块儿住教师宿舍。我很喜欢姐夫的一套黑白道运动服，他说，只要我英语考试过了60分，就把衣服送给我。

我在哈密的学校里认识了郭鸿儒老师，新疆“四大才子”之一，毕业于齐鲁美术学院。学校大礼堂两侧有两间厢房，一间是他的卧室，一间是他的画室。认识郭老师以后我就不住教师宿舍了，搬到了他的厢房里。每天做完自己的功课，我就帮他批改作业，分儿打得不高，他老怨我。

画室里有个一人多高的大卫头像。这是中学美术课的必备教具之一，但从来没人用过，最实用的一次就是被我用了。

只要有时间，我就临摹。我的画纸高、宽都是2米，展开有一面墙那么大。

灯光从石膏像的斜上方打过来，我站在5米开外的地方，用铅笔量比例、打点、走轮廓，黑白灰的过渡、头发和皮肤的肌理……然后退后几步、上前几步地虚着眼看。我用72个课时完成了这幅画，前后大约一个月，与实物完全是1:1的比例。

因“血统”而夭折的画家（2）

每个周末，郭老师的诸多同仁、朋友就到画室里来聚会。我们先一起烤土豆，吃完再去看画。所有的人看到我画的大卫，都惊诧不已，“这孩子胆儿真大！太有天分了！”

艺术创作讲究悟性和灵感。三分之一的时间，我在向老师学习。三分之一的时间，我自己对着书本体会、感受。还有三分之一是实践，不断挨骂，不断自我修正。在老师眼里，我的画永远是错，所以他永远在纠正我，他的纠正也是一部教材。

还好我聪明，懂得举一反三。

有时画静物，我找不到亮点。老师拿起橡皮，在我桌上敲了敲，“记住了，它可以调整明暗对比。”说着，拿橡皮在球上亮面轻轻挑一下，“你再虚着眼看看，是不是亮点？”

“是！”原来会者不难。

“这不就完了吗？真笨！”

我绝不让他在同一个问题上有机会第二次骂我。这或许是一种天赋，从此我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到物体的亮点。

【与西安美院擦肩而过】

高中时我回到了乌鲁木齐。我不爱说话，自我封闭，绘画就是我与外界的交流。高一开学前，去学校领了新的教科书。两三天的工夫，课还没上，我已经给所有的语文课文都配好了插图。

每天放学回家，做完功课，我就在小本上画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人物。人物按照“魏、蜀、吴”分类，公孙权、孙策、孙瑜、曹操、刘备、赵子龙、关羽、张飞……我甚至不需要参照，全凭想象，精细的白描手法。一页一个，一晚上能画四五个。

画完了，我把它拿去跟同学换邮票。一本二三十页的“三国人物”能换到一枚或一套很好的邮票，数不清我一共画过多少本。我并不

懂集邮，到底值多少钱，无从考证，只是心爱换心爱罢了。后来才知道，也有值钱的，比如“全国山河一片红”。

我所在的乌鲁木齐铁三中是铁道部重点中学，也是全国重点。高一那年，我作为学生会宣传部长，联合校团委，发起、组织了一次铁路系统的黑板报大赛，规模覆盖数十所中小学，规格相当于整个乌鲁木齐市。当时的我，对各种绘画技法都有涉及，粉笔画尤其拽得厉害。

有三天的时间，我没有参加学校的运动会，一个人在一块长约4米的黑板上，照着一本画册，用白色粉笔勾画出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的浮雕作品之一——《五四运动》。操场上人声鼎沸，枪鸣炮响，高音喇叭播放着激昂的进行曲，这一切于我只是遥远的背景，尽可充耳不闻。我的眼里只有线条、色块、明暗、凹凸，耳边只有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天青年学生们在高喊口号，慷慨陈词。既不知道饿，也不觉得累……

我的作品不参加评选，只作为展示，几乎乌鲁木齐市所有学校的校长、主要领导，都来观摹这幅画，无不啧啧称奇。

各校参赛作品以照片形式寄来，经过评委会评分，颁奖大会上，由我来宣布获奖名单。

学校大门口的“着装守则”白纸黑字写着，男生不许留长发，教导主任拿着一把剪刀站在门口，违者就地处理。也不许穿喇叭裤、榔头鞋。可我就是这么副打扮——您要是让我现在回去换发型、换衣服、换鞋？我倒没问题，操场上那几百号参加活动的老师学生，只好麻烦他们等等了。

结果，当然没人把我怎么样。

长发、喇叭裤、紫红色大头皮鞋，我站在高高的领操台上宣布获奖名单。没错，我倨功自傲，我有恃无恐。但是那一刻，我体会到了何谓“宽容”，心中只有两个字：感激。

因“血统”而夭折的画家（3）

自从在黑板报大赛中小露锋芒，学校发现我是个“绘画奇才”。过了些日子，西北民族学院艺术系来新疆招生，教导主任热情地鼓捣我去面试。我稀里糊涂带着大量素描，一些水彩、水粉作品，以及一幅油画，去了他们的招生点。

西北民院的老师看了我的素描作品，赞不绝口，天生的油画家坯子，问我：“毕业证带了吗？”

“什么毕业证？”我一头雾水。

“你高三毕业没有毕业证吗？”

“我，我开学上高二。”

“我们这是大学，招高中毕业生，你高二来干吗？”老师大为光火，空欢喜一场。

一年多以后，临近高考，班主任老师建议我报考西安美术学院。

西安美院没有面试，只要求考生将相关作品邮寄过去，合格者直接进入复试。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制度不严谨，给滥竽充数的人提供了方便，随便把谁的作品寄过去冒充一下不就行了吗？而复试只是考一些简单的常识，基本上起不到甄别人才的作用。最后一关，文化课考试，以我当时的成绩，一考一个准儿。

我挺“洁身自好”，不愿意和一群有可能“滥竽充数”的人混在一起。另一个使我犹豫的原因是郭鸿儒老师说过的一句话：“画画是讲究血统的。”我没有这个血统，未来能走多远，很难说。我冷静地考虑了几天，决定放弃美术专业。

这令很多关心我的老师大失所望，他们反复劝我，千万慎重，这可是本科文凭啊。可我没有改变主意。

一个画家就这样“夭折”了。

多年以后我又重新拾起画笔，是为了女儿。

女儿学画，我为她请了一个私人教师，教的都是中规中矩的东西。我在旁边看得兴起，没跟女儿商量，就当上了她的业余老师。

我给女儿上课，走的是“野路子”，不规律也不系统，全凭自己的经验和体会。她在幼儿园信笔涂鸦的作品我也都保留着，印象派、立体派，完全没有章法，随她发挥吧。

我喜欢让她边玩儿边学。一张白纸，我先把四个角折进去，告诉她绘画讲究留白，折进去的部分不可占用。然后问她：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公路、汽车。”

我把这两个词写在小黑板上。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山、水。”

我又写上，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好多人在摘樱桃。”

“你刚才说的这些，都叫元素。现在爸爸要把元素按远、中、近分开，然后……”

好的画作，贵在“栩栩如生”。当然，其中有技巧问题，有想象力问题，还有是否用心观察的问题。把看到的东西铺排有致地展现在纸上，对孩子来讲有难度。于是我先帮助她整合这些元素，区分开远中近、黑白灰，她再来画。画好以后，我在原图上修改。一边修改，一边给她讲什么叫“比例”，什么叫“构图”，什么叫“逻辑”。

“画画，不但要画你看到的，还要画你想到的，感受到的……”

仿佛时光倒流，我随女儿回到童年，回到自己撅着屁股趴在桌子上画乌纱帽的那个混沌初开的夜晚。

带女儿出去旅游，速写本和钢笔是我随身必备。在澳大利亚，我问她：“悉尼歌剧院像什么？”

“贝壳。”

“对。为什么像贝壳呢？”

“因为旁边是海。”

“对了，旁边有大海。”

一边吸引她注意力，我一边飞快地将悉尼歌剧院的轮廓勾勒下来。一定要快，因为女儿两分钟就不耐烦了，非拽着我走。所以我的速写本里充斥着各种“半成品”，晚上回去再对着照片完善。

我常和女儿一起翻看过去的速写本，边看边考试。

“法图麦，这是什么？”我指着其中一页问她。

“叹息桥。”她反应飞快。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威尼斯。臭水沟！”

“那儿还有什么？”

“冈都拉！”

“这个呢？”

“嗯……延安。”亏她想得出来。

“胡说！再看看！”

“不知道。”她挠头。

“我带你去过，离中央电视台不远。”

“哦……好像叫天什么？”

“天坛？”我成心误导。

“胡说！”

“那是天什么？”

“想起来了，天宁寺！”

对话间，记忆翻波逐浪地涌起。画中的时日、心情、风景，甚至阳光和温度，一一重现。

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么？

陨落的“中国帕瓦罗蒂”（1）

我的座右铭是“生命在于静止”，高中三年，从不参加学校的运动会。

高一，人家参加运动会，我自己在教室里画画。高二则是在广播室里播报各班来稿：“惊天枪后疾如飞，勇往直前不后退。高一（2）班运动员正像离弦的箭一般冲向终点，加油，加油！”

选我念稿，可能是因为歌咏比赛的时候我唱过“战士双脚走天下，四渡赤水出奇兵”，那会儿都说我嗓子好。

运动会结束了，团委书记王浩找到我，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。我跟王浩很熟，像是哥儿俩。

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办公室，里面坐着一位女老师，大约30岁。她看到我，挺激动地站了起来。

“他就是你要找的学生，叫李咏。”王浩介绍说。

“你好。”我懵懵地打了个招呼。

经她自我介绍，我才知道她是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，姓刘。高中没有音乐课，所以我几乎没见过她。她曾在上海音乐学院师从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，学习美声唱法。她从广播里听到我的声音，觉得我是棵唱歌的好苗子。

“你的声音很好，愿意跟我学唱歌吗？”她望着我，满眼热切。

我却到后来才真正理解她的心境。一个唱过《卡门》、《蝴蝶夫人》的年轻女孩儿，师出名门的高材生，毕业后却分配到边疆的一所企业中学里当音乐老师，只能唱《茉莉花》、《纺织姑娘》这类小儿科，何等怀才不遇。

“愿意啊。”我并未多想，只是觉得艺多不压身。

她脸上掠过一丝惊喜，但很快就冷静下来，对我说：“唱歌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的，需要很多先决条件，比如声带条件。”

“您刚才不是说我声音很好吗？”

“听上去是很好，但我还要带你去医院检查。”

我吓一跳，怎么学唱歌还要先去医院啊？怎么个查法？疼不疼？

带着一连串的问号，我和她一起到了医院，挂了口腔科的号。

还好，过程比我想象的简单，就像小时候嗓子疼去医院检查一样，医生拿起一片压舌板，让我张开嘴，“啊——”打着手电往里看了看。

诊断结论是：“声带闭合很好，宽、厚、长，像瓷砖一样光滑。”

我莫名其妙，头回听说这么形容一个人嗓子眼的。

刘老师对我解释说：“假如声带闭合不好，有缝隙，声音就是嘶哑的。声带的宽窄、薄厚，决定了你声音的粗细、音域的高低，表面的光滑程度决定了声音的质量。懂了吗？”

似懂非懂。我一脸迷茫地望着她。

挂号费和诊断费都是刘老师替我交的。她是真想培养一个自己的学生。

很快，我开始上课了。每周二、四两天，放学后直接去音乐教室找她，每次训练两个小时。

头一回去她那儿，她从屋里抱出一面红色的腰鼓，从上面拆下一条红绸带，扎在我的腰上。确切说，是在“小腹”那个位置。

“这叫丹田。”扎好以后，她用手拍了拍，“唱歌要用这里的气。”

“这里还有气？”我很诧异，下意识地挺了挺肚子。

“来，我教你。”她双手按住我的肩膀，让我呼吸，呼吸的时候肩膀不许动，只能肚子动。

“这就叫‘腹式呼吸’，学美声，这是基本功。我们每个人躺着睡觉的时候，用的就是腹式呼吸，今晚睡觉前，好好体会体会。”

然后是练声。“闭上眼睛，想象有一个点，在你头顶上，唱‘呜——’，用你的声音去触碰那个点，感觉丹田的鼓荡变化……”

我试着“呜”了一声，不对，像假哭。又粗着嗓门儿“呜”了一声，也不对，像狼嚎。

陨落的“中国帕瓦罗蒂”（2）

“发声的时候，声音不是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，要用脑后音。”她轻拍我的后脑勺，“从丹田出来，经过后脊梁，在这里共鸣，穿过这里顶到头顶！”

我越听越迷糊，后脑勺还能出声？

第一天就在我高一声低一声的“呜呜呜”中过去了。

隔一日又去，刘老师想出了新招数。练习发声的时候，我站在窗口，夕阳从窗外照进来，她正好看到我侧面的剪影。她盯着我的喉结，声调越高，喉结越往下降，就说明我没偷懒，确实在“气运丹田”。

“唱歌啊，特别讲究‘吸着唱’。”她说，“只有在吸气状态时，你的喉结是下降的，喉咙才会打开。”

这也太有悖常理了。以我当时有限的实践，很难理解这一点。

“见过夏天里狗是怎么喘气的吗？”看我一脸困惑的样子，刘老师突然问我。

“见过啊。”

“什么样？给我学一个。”

我心想，您可真会逗闷子，人这口气还没喘利落呢，怎么又学上狗了？

我吐出舌头，呼哧呼哧地喘了几下，还把两只手做狗爪子状抬在胸前。

“手不用学！”她笑着打我一下，“就像这样，用小腹的力量带动呼吸，没事儿就练习，对气息和肌肉都是很好的锻炼。”

我就纳了闷儿了，原来不讲究发声方式倒好，怎么一开始“专业训练”，什么气运丹田，脑后共鸣，狗喘气……特累不说，发出的声音也怪怪的。还有那个“吸着唱”，越唱越觉得倒不过气儿来。

就好比，“齐步走”和“猫步走”是两个学科，骑自行车和蹬三轮是两大体系，表面近似，实则不通，都得从头练。而且在彻底熟练之前，闹不好连以前那点儿本事都丢了。学什么东西，都要经历这么一段“不破不立”的过程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，我的喉咙打开了，每次音域扩展练习都能向上爬半个音阶，自然音域达到了12度。连老师都惊呆了，她发自内心地欣喜啊，蛰伏多年，终于等到一个得意门生。

刘老师排斥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，男高音歌唱家里只推崇帕瓦罗蒂和卡雷拉斯，其余门派皆是扰乱视听。我受她影响甚深，以至于直到今天怕去卡拉OK，一唱流行歌曲，必跑调无疑。

一年以后，我已经能够完整地唱完哈萨克族民歌《嘎哦丽泰》，这是音乐学院声乐系一年级的练习曲目。

嘎哦丽泰，
今天实在意外，
为何你不等待?
野火样的心情来找你，
帐篷不在你也不在。
我徘徊在你住过的地方，
只是一片荒凉，
心中情人几时才得见面，
怎不叫我挂心怀。
嘎哦丽泰 嘎哦丽泰，
我的心爱……

唯美深情的咏叹调。我陶醉于自己的歌声，感到了一种“准艺术家”的兴奋。

那时我很刻苦。我家旁边是一片广阔的麦田，我每天早晨6点起床，绕着麦田跑步，跑完步就在树下“啊呜咪呀”地练声，做各种气息练习。

当时我因为“血统问题”，已经放弃考美术学院的想法了，因此我和刘老师有一个约定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理想——高三毕业，我报考上海音乐学院，她为我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。我们为了这个理想太投入了，偏偏忘记了一件事。

我比较晚熟，已经高二了还没经历变声期。正在我孜孜以求梦想着成为中国的帕瓦罗蒂时，一天早晨醒来，我突然发现自己失音了。

那是一段可怕的记忆，仿佛堕入一场噩梦，无论怎么使劲，也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
母亲急忙把我送到医院，医生的诊断是“声带小结”，原因可能是长期用声不当或用声过度。

接下来很长时间，我都住在医院里，每天输液，雾化吸入治疗，打激素，脸肿成一张大饼。

同学每天都来给我补习功课，刘老师也来看过我，总是带着深深的忧郁、焦虑，还有种说不出的歉疚。时间一天一天地溜走，距离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课考试越来越近了。

每天早上醒来，我都试着对自己说一声：“你好！”发不出声儿。那段时间我从未笑过，反正也笑不出来，只是一阵听上去令人难受的嘶哑的气息。

和家人交流全靠手势和纸笔。当时我并没想到声音对我有多重要，只觉得这样哑剧式的生活实在很麻烦。

直到两个月以后，那天早上，我从床上坐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习惯性地却又不抱任何希望地对自己说了声：“你好！”

话一出口，我吓傻了。

居然发出了声音……而且，根本不是我的声音！

这声音听起来是低沉的，嘶哑的，而过去我的声音是高高悬在上方的，响亮的。

我这是怎么了？

几天以后，我又去音乐教室练声。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唱，高音再也上不去了，只剩下中低音。我的心冰凉冰凉，全完了。一年的努力，因为这场病而付诸东流。

梦碎的不只是我，还有我的老师。她在旁边为我弹琴，一边弹，一边无声地流泪，泪水真的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，止也止不住。

“你的声带条件还是很好，咱们唱不了《嘎俄丽泰》，还能唱《乌苏里船歌》。”她停止弹琴，转过身望着我，哽咽着说。

我没有回答她。在那一刻，我的内心已经放弃了。因为我还有乐理、视唱练耳等一系列专业训练没来得及完成，病这一场，老师也不敢再给我施加声乐练习强度了。我不唯心，但我突然相信这就是宿命。

后来，我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。考上广院之前我又一次去医院检查了声带。诊断结论和过去一模一样：“宽、厚、长，像瓷砖一样光滑。”老天助我，劫后余生。

听说我考上了广播学院，刘老师曾经到我家里去，哭着劝我，可不可以不要去北京。只要复读一年，明年一定能考上音乐学院。她泪流满面的样子，我到今天还记忆犹新。

或许一个老师向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，确切说是“请求”，是有些不合常情的。而我却完全理解她的用心。她的确是为了自己的理想，我是她的理想的一部分，但她又何尝不是为了我的将来?

所以，我真心地感谢她。但我实在等不起了。

经历过高考的人，都知道最后那一年剥皮抽筋似的难熬。

今天的她也应年近花甲。我一直不敢和她联系，见了面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大学，唯一的逃离之路

我怀念我的童年。

周围满目都是俄式洋楼，我们家也在一座尖角的俄式洋楼里，尖角楼里养着鸽子。

家里是木地板，要定期打蜡。打完蜡怎么维护呢？姐姐从集市上买回一大包瓜子，我负责请小朋友到家里来嗑，瓜子皮嗑得满地都是，然后用笤帚把瓜子皮扫走，扫完了，地板就变得很亮。

家里订了牛奶。每天早上送奶工一来，边走边摇铃铛，几条街都能听见。打奶是我的任务，一听见铃声就赶紧端一个大号的不锈钢杯子，出去排队。每天都能在队伍中见到一个挺漂亮的小女孩，有时候在我前面，有时候在我后面，我没有和她说过话，但却觉得和她十分亲近。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。

为了这个小女孩，我写过一篇小说，名字就叫《爱·雨中·浪漫》。写了一稿又一稿，幻想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，大约万把字，写完就烧。除此之外，暗恋的心情无可排遣。

我想逃离新疆，莫名其妙地讨厌那里，一切的一切都令我厌烦和抵触。因为暗恋，我常常感到伤心。我还拒绝参加高中毕业会考，母亲和我谈了两个小时，才说服我去向老师认错，补考。我听父母谈起过支边多年的感受，他们付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，又得到了什么？

这个地方，我一刻也不想多呆。我收拾好行囊，藏在床下，打算伺机行动。

逃离新疆，这个愿望随着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到来而变成现实。

高考之前，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面试，要招一个“西部班”。我的嗓音是天生的，而且很幸运，尽管大病一场，低了8度，

但并未影响质感。参加初试时，老师听了我的声音，便决定让我跳过二试，直接进入三试。

我压根儿没想到全家会一致反对。父亲是撰写地方史的编辑，母亲是“新疆优秀女企业家”，儿子考戏剧学院，当演员，那不是丢人吗？我姐姐还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：“演员得是浓眉大眼，瞧你那模样，开什么玩笑？”

我当时并不执著于演员这个职业，只是近水楼台的选择之一。所以他们反对，我也不做抗争。我一心盼着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快点儿来，快点儿来。

那是1987年。我的班主任老师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反复强调，考不上大学，你们呀，就在铁路沿线当个扳道工吧，没别的出路！

我每天都在家里嗑瓜子，扫地，扫啊扫，嗑啊嗑，录取通知书怎么还没到？烦死我了！

正是盛夏，溽暑难捱。身边的同学都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，我急得嘴唇上起了一个比黄豆还大的水泡，抠、抠、抠，抠出一个大血痂。

有一天，我正在擦地，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喊：“李咏！”

我家住在二楼。我停下来，扯着脖子朝窗外喊：“谁？”

不管是谁，我都没什么好气儿。

“录取通知书到了！”我这才听出来，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。

“哪儿？”

“北京广播学院！”

“你丫别哄我啊！”我把扫帚往地上一摔，跑到窗口冲他嚷嚷。

“真的！赶紧去学校，找校党委书记！他让我来喊你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略微迟疑了一下。

“真的！快去吧！”

我猛地清醒过来，惊喜啊！庆幸啊！我一步跳过横在脚边的扫帚，冲进房间换衣服，把身上穿的套头衫用力往上一掀，一下子碰掉

了嘴唇上的痂。真疼！我摸了摸没流血，就没管它。

一路狂奔至学校，进到校党委书记办公室，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对不起。”

原来，北京广播学院有规定，通知书不寄给考生个人，而是寄给校党支部书记。他老人家一看，以为是私人信件，直接揣在包里带走了。过了好几天才想起来，打开看看，什么东西？这才发现是李咏的录取通知书。

为了这张纸，我嘴唇上永远落了个疤。

考进央视，一定是狗屎运（1）

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第一堂课是吴郁老师上的。他环视着屋里这群漂亮、阳光的少男少女，一句话就给他们定了位：“你们不是明星，是广播员。”

第一次期末考，出于种种原因，我的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一。那时我有些胆怯。我是从边疆来的，人家都是北京人、上海人、南京人。头半年我几乎不说话，一个人躲在角落里观察他们。慢慢地我发现，虽然我连新疆都没出过，但他们读的书未必有我多。

而且，我的嗓子是真好。播音系的重点是发声练习、吐字归音练习。有的人练爆破音，“b、b、b……”大冬天的，就这么对着墙喷，能把墙上喷出一个冰疙瘩，这不是笨蛋吗？我从不练声，考试轻轻松松就过。

甚至有一天早上我迷迷糊糊去上课，迟到了，班主任王璐老师把我拦在了讲台边上。“洗脸了吗？”

“没洗。”我揉揉眼睛道。

“啊一个。”

所谓“啊一个”，就是用一口气，把汉语拼音的单韵母和声母从头到尾平稳地读下来。

“a、o、e、i、u、ü、b、p、m、f……”所有发声练习里，我最不怵的就是“啊一个”。

“你们都练成他这样，就行了！”王璐老师冲我一挥手，“回去接着睡吧！”

大学期间我老旷课，但是最后一次考试，我愣考了全班第一，得到了最高奖学金。有好事者提出要重新给我核分儿，我没反对，核来核去，还是第一。

1991年，大四第二学期，我被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对外部实习。央视这座崭新的大楼子，三年前刚刚落成，《新闻联播》向全国人民展

示过它的三维图像，那么神秘而高不可攀。

我们班39个学生，有三分之一都在央视各部门实习。谁不想留下来？对外部的大导演们都喜欢我，器重我，手把手地教我做事情。但毕竟他们不是台长，也不是广电部部长。

我没有“后台”，也没有“后门”，每天除了兢兢业业地工作，抢着擦桌子、扫地、打水，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。

实习期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央视开始面向各大对口院校正式招收播音员。方式比较传统，只收各校考试成绩排前5名的学生。最后定下来可以参加面试的学生，全北京一共10男10女。

学校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，但我压根儿就没抱希望。只看分数当然不在话下，可就我那长相，在我们班男生里排前10都勉强，做点儿幕后工作还行，选播音员，央视能看上我吗？

面试那天，哈文陪我一块儿挤312路公共汽车去的，一路暴土狼烟，整得灰头土脸。走到中央电视台大门口，才发现其他参加面试的人都是坐“小巴”或者“打的”来的。看他们个个衣着光鲜，哈文让我去卫生间洗把脸，好歹亮堂点儿，我就去了。进去以后，居然看见几个男生在对着镜子化妆。

面试在一楼的一间大演播室里。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，第一反应是灯光太晃眼，下意识地用手遮了一下，稍微适应了一会儿，才看清楚面前坐着一排人。

“姓名？”其中一位开始发问。

“你们不是刚刚叫过吗？知道还问？”

没人接我下茬儿，我意识到可能要“过”了，老老实实说了一句：“李咏！”

“李咏同学，现在在座有黄惠群台长、杨伟光副台长以及各部门主任。中央电视台全体员工都在通过闭路电视收看演播室里的情况，希望你正常发挥。”

“好，来吧。”我心里明明特在意，又偏装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。

考进央视，一定是狗屎运（2）

第一试是新闻快读。现场给一个300字的急稿，只有30秒准备时间，从头到尾读完，出错不得超过2处。我嘴皮子利落，玩儿似的就过了，后来听说这一关筛掉了不少人。

后来又问了我很多问题，我只记得最不靠谱的两个。

一个是：3只鸡3天下了3只蛋，请问9只鸡9天下几个蛋？

我想也没想就说："反正不是9个！我又不是养鸡的，不知道。"

另一个是：请列举5个海湾战争主要参战国家。

"美国、英国、科威特、阿富汗……其他的想不起来了。"

"李咏同学，你再好好想想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。"

我又想了想，还是想不起来。"真不知道，您告诉我吧！"

人事处的老师哭笑不得，"伊拉克。"

我当时在心里猛抽自己三个大嘴巴子，海湾战争主要参战国，连伊拉克都能忘，真行。但我立刻想出个堂而皇之的理由："伊拉克是敌国啊，咱们也同意打的！"

考完试出来，我坐电梯上16层，回对外部"上班"去，遇上一位台里的灯光师。实习几个月，我跟台里这些设备保障人员、灯光师都混得特熟，好多大导演去借设备，都说"没有"，我去借就有。

"哎，哥们儿，可能是你留。"他挺神秘，话说得含含糊糊。

"怎么讲？"

"刚才你们都走了，黄台让大家重点讨论一下你的表现。"

"你怎么知道？"

"不是全台都看闭路电视吗？最后那段儿，视频拉掉了，音频还在。我听见的。"

灯光师的话我没太上心，也不是不信，就是不想存什么幻想。

中午吃完饭，我和几个对外部的编导一块儿下围棋，心不在焉。吕斌主任一直在旁边看我。我觉得他在看我，倒也没太在意。看了一

会儿他说："李咏，你来一下。"

我刚想好一步棋，只好先放下，起身去了他的办公室。

"把门关好。"他小声示意我。

我又转身把门关好。

"坐下。你知道今天留谁吗？"

我摇摇头，"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反正肯定不是我。"

他突然严肃起来，盯着我，一言不发。

过了半晌，才一字一顿说："小子，听着，就是你。"

我当即傻了。就我那表现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啊？

"但是，目前党委还在讨论，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。所以，"他目光犀利，向我提出严正警告，"你要严格保密，包括对你女朋友！党委的事情如果散布出去，就很可能会有变动。"

我愣愣地看着他，还是说不出话。

"刚才，我看你有些心不在焉，所以提前把消息透给你。"老领导意味深长地说，"你，可不要违纪啊。"

"谢谢领导关心！谢谢领导信任！"印象中，那天一直到我离开吕主任的办公室，来回来去说的就这两句话。

接下来几天，哈文挺心急，天天问我："怎么样？有消息吗？"

我强忍着内心纠结，装作很茫然的样子对她说："没有啊，没人通知我。"

我心里埋怨，这吕主任也是，告诉我干吗呀？又不让跟别人说，还不够我难受的！

几天以后，央视正式通知我被录取，我这才扭扭捏捏向哈文坦白："其实，这件事吧，我上礼拜就知道了，没敢告诉你。"

话音未落，即遭暴打。

"你连我都瞒？胆子够大的啊！"哈文叉着腰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。

我一边委屈地辩解：“我有什么办法？这是党的纪律。”一边恨自己嘴大心窄，藏不住事儿。

1991年中央电视台唯一的一个播音员名额，归我了。

考进央视，一定是狗屎运（3）

我听说有这么几个原因，首先，领导们通过几只鸡下几只蛋的问题，觉得这孩子挺直率，不装——装也没用，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道小学生“奥数”的经典题目，太损了。其次，这孩子挺机灵，没想起伊拉克，还能给自己编个理由，是否合理不论，贵在张嘴就来。

这件事到这儿，原本可以告一段落了。忆其始末，我明白了几个道理：第一，不该知道的最好不知道；第二，既然保密，就让它彻底烂在肚子里，打死也不说；第三，世界上确实有“狗屎运”这种东西存在，我李咏，何德何能?

然而福无双至，与狗屎运结伴而来的往往是一宗坏消息。没过多久，我果然对另一个词有了深刻的体会，那就是“造化弄人”。

我的档案上新盖了几道戳：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办公室，中央电视台人事处，北京市公安局户籍管理处。看似板上定钉，一切都没跑了。

一天中午，我正在睡午觉，梦见自己成了范进，站在马路当间振臂高呼：“中了！中了！”却被迎面上来的老丈人扇了一个耳光，“该死的畜生，你中了什么！”

我一激灵，醒过来了。还真有人在旁边猛拍我脸蛋，“哥们儿，醒醒，快醒醒！中央台不要你了！”

我何曾受过这等刺激，“腾”地坐起来，恶狠狠地盯住他，“扯什么淡呢！”

“真的真的！系主任让你赶紧去一趟！”他语速很快，看上去不像开玩笑。

“我靠！”我一把推开他，俩脚往鞋里一塞，“噌”地奔了系主任办公室。

“章都盖完了，怎么说不要就不要啊？其他台我都已经推了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”

系主任搓着手，很无奈地告诉我，他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，具体原因还不清楚。

看来跟他理论也没用，我又火急火燎跑到了中央电视台。

出面接待我的是一位长官，他慢言慢语地向我解释："你进央视，要占用一个国家人事部的干部指标，但今年广电部没有名额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还在努力。"

回学校的路上我精神恍惚，没坐车，忘记了要坐哪路车，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，直到天黑。

当然，您不用猜也知道，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，否则今天我也没机会在这儿给您痛说革命家史。

非常感谢广播学院的刘济南院长，她很重视此事，马上就去广电部了解情况，为我争取这个名额。而她发现，事件的缘由简单得可笑：毕业分配前夕，广电部干部司曾经问过中央电视台："你们今年招播音员吗？"央视的回答是"未定，不好说"。于是当央视最终定下一个人选，临时告知广电部，对方不干了。问你的时候不说，现在想起来要名额了？没有！来了个下马威。

别人没收拾，光收拾我了，三天瘦了一大圈。

现在想想，太好笑了。

拿到中央电视台的出入证后，我郑郑重重地把它挂在脖子上，和哈文在央视大楼子前面照了一张合影。有时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没什么事儿，也会把这张出入证拿在手里，摩挲来摩挲去，反复端详，心中五味杂陈。

这天中午，我又在欣赏出入证，老觉得背后有人，扭头一瞥，没看见谁，于是继续欣赏。

不对，还是觉得有人，使劲儿一回头，这下看见了。

"石老师！"我"噌"一下跳起来，立正站好。

站在我背后的，是纪录片《空中丝绸之路》的总导演石宪法。

"是不是感慨良多啊？"他笑眯眯地问我。

听这话，应该是瞅我半天了。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“李咏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你等着吧，不出两三年，”他在我脑门儿上点了一下，“你这块尖石头，就会被磨圆的。”

《幸运52》缘起（1）

【直接从天上撒钱的节目？服了！】

我一向不相信宿命，那太唯心，但我不反对命中注定的事儿，比如天上掉馅饼，正砸我头上。这不，当我在央视默默无闻混了7年，眼看就要奔三，却只成家未立业，《幸运52》来啦！

1997年，我29岁，在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当导演兼主持人。工作能力尚可，公众知名度为零。台里的同事说起李咏，熟点儿的，知道是《天涯共此时》主持人，不熟的，只知道我是成天张罗两岸寻亲，帮“北京刘大妈”找“台湾王大爷”，“老坐着，腿有毛病”的那位。至于长相，记不清！

一天，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突然找上门来，让我为一个外国宣传片配音。配音是我老本行，不过这片头让人十分费解，跟我以往配的那些历史片、纪录片、科教片都不一样。花花绿绿，闹闹哄哄，几个大写英文字母“GO BINGO”。

我问我同学：“这什么意思？GO……去哪儿啊？”

“去博彩！好玩儿着呢。”

“哦，博彩，看看！”

我这位同学年龄不大，来头不小，是欧洲传播管理顾问公司（ECM）驻中国首席代表。

ECM公司，在全球娱乐界都是响当当一块金字招牌。他们靠着做节目、卖技术、卖服务起家。《GO BINGO》是他们的看家大戏，在英国持续播出30年，长盛不衰。我同学的任务，就是给它在中国找个好买主。

俗话说，万事开头难。在中国兜售外国节目，难上加难。要不她怎么找着我了呢？就我这嗓子，在配音界有多大名气不敢吹，但我当年“冒充”赵忠祥老师配过的一期节目，直到今天也没人听出过破绽。

按说，作为一个资深配音演员，我也挺见多识广的，古今中外，啥节目没见过？但眼前这个《GO BINGO》愣让我看傻了。

这是一台直播节目，演播室大门敞开，购票即可进入，参与现场博彩。场内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，每期竞出一名大奖获得者，随着“砰”一声巨响，花花绿绿的英镑就哗哗哗从屋顶上往下飞啊，天女散花似的，总额高达20000元！

太新鲜了，看得我直咽口水——这个节目，好！

当时，我在对外部是独立编导。所谓独立，就是我有自己的节目代码，凭这个代码，可以支付节目组日常费用。我有自己的摄制组，自己的摄像，自己的音响，自己的场记，自己的制片主任。权力不敢说大，但掌管着自己的小王国，逮谁跟谁摆谱儿，眼光苛刻得要命。

而此刻，我服了。

我的第一反应就是：这个节目应该引入中国！

至于怎么引，再说。

我先找到对外部的长官，安排时间请他看样片。几天之后，官方答复曰：“这个节目不适合中央电视台。”

我们对外部面向的主要观众是海外华人，照我理解，这种洋玩意儿接受起来不难吧？但长官既然发话，我也不好驳回。

可我倔啊，不甘心！

顶着越雷池的罪过，我又把它推荐给文艺中心。文艺中心的长官倒是没回绝，说：“我看看吧。”哪想一压就压了快三个月。三个月以后，终于有了回音：“这个节目没法嫁接。”

事情往往是这样，长官随便找个理由，就能把话圆上，啥破绽没有。可我不好交待啊。我心里挺内疚，对不起我同学，人家也怪不容易的。

怀着最后一线希望，我又把节目样片送到了央视二套。这一次，大为意外。只过了半天，我就接到时任广告信息中心主任谭希松的电话：“片子我看了，这是一个新东西。对我来讲，它只是个项目。如何

把它变成一个节目，如何透过这个节目赚取收视率和广告，那是你们的事情。

《幸运52》缘起（2）

说了半天，到底啥意思？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

我被绕得二晕二晕的，不过紧接着，她说了一句我永远忘不了的话：“这个项目，我要了！”

我的妈呀，那话是谁说的来着？上帝关闭了一道门，肯定会打开一扇窗。上帝拿走你俩馒头，肯定还你一个大馅饼！

【“要不你当主持人试试？”】

经过一番洽谈，央视从ECM公司买进了《GO BINGO》的节目播出权、使用权，以及全部节目制作资源和技能，以40万英镑成交。预付5万英镑，余款在节目播出三个月后付清。您看好这几个字，“节目播出三个月后”，有故事，我这儿先打个伏笔。

头回引进这么大型的娱乐节目，台里格外重视，专门组建了一个重量级的班子——男女搭配，共计三人——郭艳、孙吉、詹未，担任新节目的导演。巧的是，我跟这三位都熟，他们是我和哈文的大学同学。

这几个人在料理节目的同时，开始找主持人。我听说，他们拉了一张单子，甭管老的少的，都有头有脸，候选者多达五十几位。

那时中华世纪坛还没建成，梅地亚中心北边是一溜儿家常小饭馆，很便宜。一天，我和三位老同学聚在一起吃饭，他们一个个都苦着脸，不吱声儿，低头“呼噜呼噜”喝粥。

“咋了这是？”我问。

“找主持人呢。”忘了是他们中间谁哀怨地说。

“找呗，找着了吗？”

“哎……”一声长叹后说，“挺多的，不好选。”

反正帮不上忙，得，我甭多嘴了。

我夹起一块土豆，正往嘴里送，哎？怎么突然没声了？再一看好嘛，对面仨人六只眼睛，都直不楞登盯着我。

“李咏，你现在是主持《欢聚一堂》？”先开口的是郭艳。

“是啊。”我嘴里包着半口米饭，土豆悬在半空中。

“周播？”孙吉追问。

“两周一播。”

“提前录制？”詹未又问。

“是啊。”

“那……挺闲的吧？”

这问题，问得忒敏感，我心里发毛，但话还得照实说：“除了配音挣点儿外快，基本上挺闲的，也就是平时看看稿子。”

“要不你来试试？”仨人几乎异口同声。

哦，我试试……什么？我试试？！

别看这节目前期是我帮着牵线搭桥，当主持人，还真没敢想。

犹豫了犹豫，扭脸在旁边窗玻璃上照照——咱也不失为英俊少年一名，试试就试试！

“行！”我答应着，把土豆塞进了嘴里。

我们一行四人，来到梅地亚中心酒店外的一片空场里。当时那儿还种着好多小树苗，现在已经改成停车场了。

孙吉在我对面架起了机器。我问他：“说啥？”

“想说啥说啥。”

“说多长时间？”

“三四分钟吧。最好按着节目的路数讲个故事，反正那节目你也看过。”

我何止“看过”啊？每次上报样片都被退回来，一退回来，我那同学就来找我，一找我我就在家又看一遍，琢磨这节目到底好在哪儿，怎么才能说服领导。为此我还专门刻了张盘。所以，我对原版节目里那位主持人的形象、风格简直熟悉透顶。

面对镜头，我开始编故事，自由发挥，还越俎代庖指挥导演，“孙吉，你得把机器摇摇晃晃的，这样，这样，哎对喽！别老这么端着。”

摇摇晃晃录了七分多钟，拍完了。我就当是给朋友帮忙，没多想，接下来该干吗还干吗去。

随后这盘录像带被送到了中心，中心领导和ECM派来的英国专家负责审片子。据说当时情形是这样的：英国专家审了很多主持人的样片，当看到一个叫李咏的张牙舞爪出现在屏幕上，他示意“停一下”。

《幸运52》缘起（3）

问：“他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答：“中央电视台的。”

问：“是主持吗？”

答：“是学主持的，他没好好干。”

问：“他现在的年龄？”

答：“29。”补充，“虚岁30。”

英国专家沉吟片刻，示意：“再看看。”

又看一遍以后，果断拍板，“就是他。”

与此同时，谭希松主任也在百十个候选者中，独独相中了我。她找到我们的部门主管，说：“你们别瞎耽误工夫啦，划拉那么多人。通知李咏，让他主持这个节目。”

然后就有人直接给我打电话：“哥们儿，你当上《幸运52》的主持人啦！”

哦，不对，那时候节目还没名字呢。

【“将来你火了，得把哥儿几个名字印T恤上！”】

在今天看来，这当然是个好消息，大好的消息，但在当时不是。很多人劝我，包括我的长官，老长官。

“别去，为你好，真的。”

“这个节目啊，风险太大，保不齐哪天就被毙了。”

我很简单，喜怒形于色，十句话你就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很好奇，永远想尝试新鲜事物，为了兴趣可以不管不顾。所以，我没有任何深谋远虑地，毅然决然地退出对外部，调到了《幸运52》节目组。

刚刚加入节目组，我兴奋得不得了，将A型血的特质发挥到极致，什么都管，什么都干。好奇！好玩儿！

当时，也有几家地方台购买了《GO BINGO》的使用权，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，当然要与众不同。所以我们不但改，而且大刀阔斧地改。ECM公司派出一位英国工程师，根据我们的流程专门设置程序，薪水是每小时1000英镑。

原版节目的模式是数字背景墙，数字的排列组合经过严密推算，以确保游戏公平。我们将数字改成了商标，4排13列共52个，和原版设计原理相似，形式不同。

到今天我也没想通，为什么商标非得是52个，而不是53个，55个？据英国工程师说，跟概率有关系。

英国工程师给节目起名Lucky 52，中文名字由此定为《幸运52》。

《幸运52》从诞生之初，就意味着多项突破：节目的形态、利益、传播、整体制作，都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准，也就是今天所说的“制播分离”。

节目组只负责制作。招商引资、后期推广、广告交易等任务，都由CCTV独家授权制片公司——其欣然广告公司承担。当然，赚了也都是人家的，没我们什么事儿。

其欣然也不欣然了，上哪儿去招这52个商标？节目还在拍样片，拍完样片才能上报编委会，编委会许可才能正式录制播出。而商标意味着什么？真金白银啊。谁愿意平白无故把钱扔给一个连“准生证”都没有的节目？

这时候我就发现，做任何事情，只要长官认可、支持，那简直就太容易啦。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是多么地有力度！谭希松女士为此召开紧急会议，雷厉风行，一呼百应。一下午时间， 52个商标全部招满！

这52家厂商就偷着乐吧，他们哪里想到，仅仅3个月以后，《幸运52》火啦！广告位爆满，您削尖了脑袋都挤不进来！

“其欣然”也跟着火了。老板原先开一辆“面的”，第二年换成了“宝马”。

与我几乎同时加入节目组的就是关正文。我看过老关写的东西，通过朋友介绍，请他出山担任总撰稿。节目要本土化嘛，文字统筹也是不可忽视的。

每小时1000英镑的英国工程师对节目提出两点建议：第一，形式一定要活跃，耍得开；第二，主持人非常关键，是这台节目的灵魂。只要他一出现，现场节奏完全由他把握，谁都挡不住。

《幸运52》缘起（4）

我跟老关说，咱俩得找个地儿，我这个“节目的灵魂”需要您包装包装。

上文提到过，因为是首次引进如此大型的娱乐节目，台里非常重视，在物资方面也十分慷慨。组里只有五个人，却配备了一张很大的办公桌，围坐七八个人都绰绰有余。问题是我们五个人也不能老坐一块儿啊。三位导演讨论舞美、灯光、流程，我和老关得讨论节目的灵魂啊。怎么办？还是没地儿。

我就瞄上了播音组组长赵赫那间屋子。等啊等，等到了下班的点儿，我蹭过去笑眯眯地讨好赵赫：“赤赤啊，该下班了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赶紧回家吧，造个小孩儿玩玩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赤赤疑惑地看着我。

“我就是想借用一下你的办公室。”我嬉皮笑脸地说。

说是办公室，其实就是一个大办公桌。说是大办公桌，其实是两个窄桌拼起来的。

我和老关一人坐一头，开始海聊，每个环节都聊到了，开始怎么说，中间怎么说，结尾怎么说，才能让观众爱听、爱看。

和我们俩隔着半截人工墙的，是三位导演，头碰头坐一起，夜以继日，捋节目流程。

在赵赤赤的办公室里，和老关围绕着“以何种状态操纵节目”谈了三天，不断推翻既有的思路，又将其中真正可行的重新立起来。立了推，推了立。最后达成一个共识，我的语言要达到一个总体标准，这个标准就是——有话不好好说。

怎么个意思？打个比方，武松不说武松，非说是“潘金莲她小叔子”。丈母娘不说丈母娘，非说是“我老婆她妈”。

谈工作之余，我们也扯点儿闲篇儿。说得最多的，就是将来有一天节目红了什么样。哥儿几个说：“李咏，到时候光你一人出名可不

行，得把我们的名字都印在你T恤上，一出门就穿上！”

有一天我在梅地亚一层的西餐厅还碰到了谭希松主任。为了感谢她这位伯乐，我说：“谭总，我请您吃饭！”

“得了，别跟我玩儿虚的。等你将来红了，请我吃顿大的！”

这顿饭我欠到今天还没还呢。

录制第一期节目就很有意思。节目时间不长，只有35分钟，可是我光热场就热了40分钟不止。因为整个环节推演得非常严密，科技含量还挺高。主持人“砰”一拍，出什么商标，什么音乐，都是自带的程序。观众不理解。我就拼命给他们讲解，不断做演示，讲笑话，用力过猛，逗得我自己满头大汗。

但是观众很快就跟我一路High起来了，群情激昂，沸反盈天。原来还有这么好玩儿的电视节目！还有这么没正形儿的主持人！还可以这么轻松愉快地赚奖品，赢奖金！

在一片沸腾、起哄、欢呼声中，我这个不像主持人的主持人，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价值。

1998年11月22日，星期日，早上7：15，《幸运52》偷偷地开播了。

我们心里没底，怕万一开播，某位大人物看不惯这份闹腾，或者说看不惯我，“啪”地给毙了。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个点儿，除了老人和孩子，大多数人都还沉浸在梦乡。大家伙儿都捏着一把汗，要是真被毙了，我们就偷偷地来，偷偷地走。

我压根儿没想到的是，每周日早上“偷偷开播”的《幸运52》，居然引起了很大反响，收视率一路飙升。长官中间，也出乎意料地没有发出任何反对的声音。当时，收视率还算不上“硬指标”，却足以决定一个节目能否继续生存。

三个月后，当我们终于获批正式的“准生证”，播出时间调整到了中午11:15——这个点儿，不说黄金，至少也是18K白金吧——观众反

倒不习惯了，纷纷打电话给总编室问：“早上七点一刻那《幸运52》呢？”

《幸运52》缘起（5）

【英国人蒙了：到底谁欠谁啊？】

请注意，现在，节目已经播出三个月了，可我们还欠ECM公司35万英镑呢。我是金牛座，特在意钱，最不喜欢差人钱，更何况咱央视不差钱。

英国那边开始催账了。我心里向着我同学，之前折腾人家一溜够，现在又拖着不给钱，回头再影响了人家的年终奖……不成，我也帮着催。

我给长官垫话儿："咱还欠着人家钱呢！节目也播了，时间也到了。"

长官迟疑再三，问了一句："那……万一被毙了呢？"

"这不是没被毙吗？毙了也是咱自己的问题啊。咱买的是人家的技术，1小时1000英镑，开什么玩笑！"

催促再三，未果。从这儿您就看出来了，为什么节目组的兄弟姐妹都叫我"李师傅"，整天瞎操心，操闲心，除了擦地不管，什么都管。

这时候，英国专家已经回国了，身价太高，受不了。留下一个美国总监在这儿盯着。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家临走时往程序里设了什么机关，三个月到期不给钱，直接罢工。几天以后，我们录制新节目，出问题了。

节目刚刚进行到一半，我正手舞足蹈领着大家玩儿，机器突然"啪"，歇菜了。现场工作人员查了查，据说是电路板的问题。这美国总监也不懂技术啊，瞎了不是？台下坐着好几百观众呢。

同时购买过这套程序的还有几家地方台，于是，我们迅速通告了最近的齐鲁电视台和河北电视台，请求救援。可是他们的程序和我们还不一样。他们沿用的是《GO BINGO》原版数字模式，而我们改成了商标。

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懂技术的只有那位英国专家，可这大半夜的，他坐“神七”也来不了啊。

我们内部的技术人员开始抢修，我则站在台上安抚群众，给大家讲笑话，说段子。时不时问问后台：“好了没？”“没呢！”成，那咱接着聊。

聊着聊着，我一扭脸，看见我们的一位摄影师搬着把椅子走上台来，往我身边一放，示意我坐。我明白了，这机器一时半会儿是修不好了。

坐下来，我接着和观众神侃。山南海北、天上地下、祖宗八辈的故事都讲完讲尽，大约过了40分钟，我们得到的最后通告是：今天修不好了。现场每位观众获赠一个小礼品，然后散场。

当时的心情，我不知道怎样去形容。

我这人，在乎过什么啊？我偏偏就在乎了这节目。

我热爱它，它新奇，它好玩儿，它与众不同！我也热爱这些观众，他们充满热情、激情，跟我一起撒野，随着我的节奏开心着，亢奋着。他们对我的笑容都不一样，让我深深地感动。

我真想多讲几个故事，说几个笑话，拖延拖延时间，让它修好，还能继续录。可是不行。

我无法面对观众失望的眼神儿，难受。

过了一会儿，人都走光了。我还一直坐在台上，愣愣的。

詹未过来拍拍我肩膀，“你怎么还不走啊？”

我摇摇手，无力地说：“你让我适应一会儿。我出不来，特难受。”

“哥们儿，至于吗？你不会哭吧？”

我抬起头看了她一眼，没好气说了句：“你不理我的话，我最多再有10分钟就过去了。”说完，还真的忍不住“潸然泪下”。

两个字：遗憾。

经过评估，这期节目全部费用支出，包括演播室、舞美、灯光、设备、人员、服化道，等等等等，一核算，好几十万！这还没算广告收入呢。

哎？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——注：这可不是我说的。

相关人员马上致电ECM公司，大意是，贵公司程序损坏，直接造成我们上百万元的财产损失，您说怎么办？赔吧！

这下把英国人给难住了：我还有35万英镑没收回来呢，先赔你上百万？

我方人员称：您先把我们这钱赔了，我们马上付您余款。挺大一外企，得讲究“三包”吧？

英国人语塞。这不成那谁说的了吗？“您咋这抠呢？一个菜不点，完了我还搭一个？”

于是，到底谁欠谁，就这么不了了之。

您要问，这点子是不是我坐台上惆怅的那么会儿工夫想起来的？

还真不是。

和ECM的关系就这么崩了。

英国人打小算盘打不过咱，商业敏感度可高了去了。咱这儿还盘算着怎么赖账的时候，人家早早就抢注了“幸运52”和“Lucky 52”这两个专利名称。

直接后果就是，《幸运52》不能再叫《幸运52》了，于是我们把节目名字改成了《夺标52》。就这么凑合了三四个月，实在凑合不下去了，整个程序都乱套，凡涉及人家专利的，概不能用。

我前面怎么说的？只要领导支持，什么事儿都好办。事实再次证明了这一点。

就在这个焦头烂额的节骨眼儿上，两任台长交接。承蒙新台长厚爱，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——用他自己话说：“给你擦屁股去了。”我心说了，给谁擦屁股呢？我一个人的节目啊？

谈判，要求恢复《幸运52》的名字。然后，有一些程序我们仍然可以使用，还有一些程序被他们收回，由我们另行模拟一套。

《夺标52》又变回了《幸运52》。很多观众问："为什么是52？"这个问题，基本上属于"随机数学"范畴，我们哪儿懂啊？想来想去，只好这样自圆其说："一年52周，周周都幸运嘛！"

当砸蛋遇上扯淡（1）

【砸蛋，为给自己“长戏份儿”】

“当砸蛋遇上扯淡。”打一台中央电视台娱乐节目。答案当然是——《非常6+1》。

砸蛋的是您，扯淡的是我。

说起这档节目，那真是“时间在扯淡中度过，节目在混乱中产生”。

2003年，北京闹“非典”，5个人以上不许扎堆儿，《幸运52》的录制也只好暂停。正巧这会儿，原二套每周日晚播出的《正大综艺》改回三套播出了，于是19:30到21:00这个时段出现了一个节目空挡。

领导下令，成立一个新节目研发小组，封我当组长。小组工作目标：研发一台收视不输于《幸运52》的大型综艺节目。这就是说老大基本养成型了，督促我赶紧生个老二，不比老大聪明，就比老大漂亮。

我们都挺认真，在世纪坛那儿召开了好几次露天的专家研讨会和观众座谈会，反正大家都没什么事儿干。每个人都戴着口罩，离着八丈远，互相喊话，场面挺壮观。

既然档期是在周末晚上，属于家庭时间，节目类型就得奔着轻松愉快的方向去，尽量让人“过小脑，不动大脑”。

我们还在梅地亚酒店开了一间客房，哥儿几个凑一块，喷云吐雾，观摩最新的外国样片。小道消息不是说，抽烟喝酒能灭SARS病毒吗？白天把烟抽足，晚上回去再喝一瓶“科罗娜”，打那会儿开始就种下了酒瘾。

样片是我托朋友从英国找来的，请了一位国际关系学院的大学生当翻译。有一天，我们看到一个格雷纳达公司的短片，灵光突现。

这也是一个“真人秀”。节目组深入民间，专门挖掘多才多艺的普通百姓，把他们请过来，集中培训，专业包装。一周以后，各位选手

脱胎换骨，判若两人，足以让人惊掉下巴。乡下来的傻小子成了摇滚巨星，相夫教子的中年大姐变身蓝调歌后。

嘿，有点儿意思，这不就是英国版的“好梦一日游”吗？跟我们的既定目标高度契合——麻雀变凤凰的故事永远有人缘。

我们直奔台长办公室，请他老人家审阅。我坐在台长左边，他右边是副台长，当时的制作人尹文负责放带子，哈文站着旁听。

样片就4分钟，刚看出点儿眉目就完了。

“这么短？”台长意犹未尽。

“台里不是经费紧张吗？”我信口胡诌，“我自己花钱在英国雇了个人，先做个短的您看看。怎么样？挺好吧？”

“嗯，还行。”台长点头。

“这就是让普通老百姓也有机会登上舞台，实现梦想。”

“行，再改改。”

长官点了头，拨了一笔不大不小的经费，让我们先做两期样片。

台里演播室太抢手，排不上档期。我们在大兴的一间1200平米演播大厅落了户。大兴位于北京东南郊，离城挺远，来去都不方便。唯一可喜的是旁边紧挨着一片西瓜地。俗话说：“平谷的桃儿，大兴的瓜，人人吃来人人夸。”大热天儿的，看着就高兴。

那是6月底，“非典”疫情刚刚消停点儿，观众还都戴着口罩呢，进门先测体温。

开录之前我就琢磨过，这个节目跟《幸运52》不一样。《幸运52》离了我就断了线，可“6+1”的选手们个个光彩夺目、才华横溢，还有我什么事儿啊？就剩下报幕了。

不成，我得给我自己搭个小台子。

我设计了一个与场外观众互动的游戏环节——翻牌。一共两张牌，一张金葵花，一张银葵花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才艺，我就跟场外幸运观众连线。电话接通以后，您说翻哪张我就翻哪张。有奖没奖，看您运气。

当砸蛋遇上扯淡（2）

为什么想出这招呢？一是增加场外观众积极性，要是光我们自己玩儿，没别人什么事儿，那就没劲了。二呢，也是给我自己创造一块逗贫的空间。

我们的口号是："既然有梦想，干吗你不来？"

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，观众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写下来。

一开始，留言都是大白话。

"咏哥你好，我想要一张婴儿床，我老婆下个月预产期。"

"我儿子今年上初中，我想送他一辆自行车。谢谢咏弟！"

后来大家伙发现，编成段子说，中标率高。于是又都编成段子。

"一个好汉三个帮，咏哥和咱贴心肠。明朝新婚大喜日，就差一张双人床。"

"七月骄阳红似火，汗流浃背好难过。咏哥若把空调送，窗外酷暑奈我何？"

民间的智慧了不得啊，从这些短信您就能看出来，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作家。老跟他们一块儿混，我也长才情，要不怎么都敢出书了呢？

我可喜欢这个环节了，因为可以打电话忽悠人啊。以前都是当面忽悠，这回改远程了，他明我暗，个个给忽悠得一愣一愣。

有时候我冒充电话公司的，"您手机欠费很严重啊！上月欠了200多块钱，我们直接从您工资卡里划走了啊。"

有时候我冒充调查公司的，"请问您对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李咏有什么看法？比如他的头脑清醒度、口齿、容貌……"

有时候我冒充煤气公司的，"这刚几点啊，您就睡啦？您家煤气表字儿都走没了，知道不？明儿早点只能外面买了啊。"

因为我们录节目没点儿，从下午到半夜，都有可能。所以接电话的也是千姿百态。有人正睡觉呢，十分没好气儿。有人正约会呢，很

是不耐烦。当然了，最后一听说是咏哥给圆梦来了，立马来神儿，什么事儿能比这还重要?

冒充###那次，接电话那哥们儿手机信号不好，我这边听不清，就指挥他：“你蹲下，再站起来，好点儿吗？”

“好点儿，是好点儿。”

“再多来两次，就彻底好了。移动通信嘛，越移动越好使。”

“嘿，还真是好多了！”

现场观众那叫一个乐啊。乐够了，我言归正传。

“我说兄弟，我跟你开玩笑那，我是中央电视台《非常6+1》主持人李咏。”

“哎呀妈呀，咏哥，真是你吗？”小伙子声音一下子高了8度。

“真的是我。你在干吗呢？”

“我正在医院打点滴那，发烧，哎呀妈呀老难受了，一听你声音我好了一大半！”

哟，早说啊兄弟！我要知道你发着烧呢，也不让你来回来去蹲下起立了。

不过两张葵花牌翻来翻去太麻烦，而且成功率高达50%。这事儿本身没什么不好，但到了长官那儿就严重了，典型的“不劳而获”啊，审查八成通不过。因为一个环节，折一台节目，不值当。

我们哥儿几个好一阵冥思苦想，怎么给它改头换面，操作起来既容易，又符合长官提出的要求：强调精神财富，跟“梦想”挂钩。

又是翻励志书籍，又是找格言警句。“梦想是心里的一颗种子”，“梦想是远方的一座灯塔”，“梦想是天边的一道彩虹”……最终杂志上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们——梦想破壳而出。从哪儿破壳？对啊，弄个蛋呗！

上帝说要砸蛋，于是就有了砸蛋。

金蛋银蛋各三个，长条案上一字摆开，选中哪个砸哪个，金花四溅，梦想成真。

有意思的是，后来当砸蛋进行了一段时间，网上居然有热心观众举报，说是根据多期节目统计，金蛋比银蛋成功率高，有失公正。

当砸蛋遇上扯淡（3）

好，我听您的，咱们废除银蛋，全上金蛋！

老百姓真是太喜欢这个金蛋了！要模样有模样，要内涵有内涵。

每次除了节目要用的六个，我们还会额外准备出十几二十个。这是现场最抢手的纪念品，特别是小朋友，人手一个，拿家砸去！

又说回那个录样片的炎炎夏日。用了两个下午加一个晚上，两期样片录完了，接下来就是送审。送审又分两步，第一步是在中心内部汇报。中心主任认可，再向台里编委会汇报。台里编委会通过，才能颁发“准生证”。

在中心汇报时，我负责节目推演，就是向长官忽悠我们这节目怎么好。为了增强现场效果，我手脚并用，载歌载舞。

“请注意，这时主持人出场，哗——场上放冷烟花！”我双手举在半空，触电似的抽抽。

“停！不许做动作！”我们主任立刻识破我的伎俩，禁止我在推演过程中渗透非客观因素，以防扰乱视听。

“哦，好。”我点头称是，“这时候，唰——灯光大亮！”

“停！不许用象声词！”

“接下来这个环节叫做Call-out。”我整了个夸张的口型。

“停停停！说中国话！”

“就是……就是给场外观众打热线电话。”

“谁打？”

“我，我打。”

就这么磕磕绊绊地推演完毕，大家一致说好——不是说我好，说节目好。

主任一眼看穿我那点儿小心机。“还弄什么‘抠奥特’，目的很明确嘛，给自己长戏份儿呗！”

“对，就是这意思！”我嬉皮笑脸。

两期样片全部如期播出，一期没废。

所以，诸位同行，这可是经验之谈啊。当你遇到一个全新的栏目，务必在其中给自己寻找一个小平台，否则它立不住。像我这样蛮不讲理型的，可以强行搭建。您要是温文尔雅型，也可以通过和平演变来达到目的。总之，一台节目应该是主持人的外套，量身订做。但凡成了披肩，谁披都行，就不好玩了。话说到这份儿上，您知道我为什么特怕上春晚了吧?

【李咏这孙子都这岁数了，还这么红！】

我们给新节目起了名字，叫《非常6+1》，干脆利落。

为什么叫“非常”？因为在我们的舞台上，普通百姓也散发出明星的光芒，不同寻常。

“6+1”就更好领会了，练兵六日，用兵一时，正好又是每周日晚上播出。横不能叫“非常大礼拜”对吧?

我跟“7”有缘，说来很巧。我的大学宿舍是7号楼，我的第一台汽车尾号是7，我家的门牌号是2701。《幸运52》，《非常6+1》，加一块儿还是7。

我就是奔着大俗特俗去的，公然站在舞台上向全国人民喊话：“现在就拿起手机，发送短信，只要1块钱，万一砸出个数码DV呢？万一砸出个海南双飞呢？”

您听这话，搁观众耳朵里是中听、亲切，搁长官耳朵里，不是找事儿吗?

要了命了，长官不高兴啊，“这话你也敢讲？多强调精神财富好不好？”

“我这都是大实话啊。”我苦着一张脸，替自己申辩。

谁说不是呢？老百姓给电信行业做那么大贡献，一条短信顶平时十条，就为了图个吉利。这些钱也没装在我兜里，不都是上交中央电视台了吗？那么多商家都上赶着给节目提供奖品，咱回馈老百姓有何不妥？天天就受教育啊?

窦文涛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找不到快感就去找真理。”君不见我身边，藏龙卧虎。真理、公德、道义，全让小白、小崔等各位老师扛了，轮到我做节目，真不知道还能扛什么，只好找幽默吧。

当砸蛋遇上扯淡（4）

小崔是冷，小白是冷上加霜，我就当那冰雪过后明媚的阳光，最灿烂的还是咱党中央。

我愿意逗大家笑。逗了这些年，大家看见我就想笑。想当初，胡玫导演还邀请我演孔子，说孔子就长我这样，瘦长脸，小眼睛。我演他基本不用化妆，粘一绺山羊胡子就成。人贵有自知之明，得亏我没言声。

我喜欢沸腾，希望现场“爆起来”。电视机前的观众假如正在按顺序翻频道，翻到这儿，至少会停留一下，“这都吵吵什么呢？”只要内容衔接得好，或说后期剪辑得好，观众就可能多停留三分钟。只要停留三分钟以上，嘿嘿，对不起，您已经作为“样板户”被纳入进来了，收视率“呗儿”的一下，再攀新高。

每回录节目，我从楼上化妆间出场，全体观众起立，手中棍棒狂舞，齐声欢呼：“李咏！李咏！李咏！”

我感动得了不得啊！既然假充文人，我也不忌讳酸词儿了：主持人做到这个份儿上，夫复何求？

我顺着一个旋转楼梯就往下跑，有音乐，有鼓点儿，不由自主就越跑越快，因为大家的掌声越来越热烈，呼声越来越高。楼梯上光线很暗，好几次我脚下一个踩空，连滚带爬就骨碌到观众们面前，也挺好，省时间。

我的开场白是这样的：“谢谢大家把这么宝贵的时间给了《非常6+1》。你们旷课的旷课，旷工的旷工，有的还耽误了约会。既然到这儿，我只有两个请求，第一，别把自己当外人，进了演播室，就都是演员，我们共同努力。电视机前还有更多的观众，气氛靠谁？就靠你们了。”说到这儿，我给大家鞠个躬。

“录节目中间，难免有些磕磕碰碰，可能不会像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么顺当。放心，会留给你们足够的尿尿的时间。”

“我们一会儿会有一个开场舞蹈。那位小伙子，你坐得低啊，姑娘们那裙子一转起来，你啥都能看见，眼睛别给我犯直啊！”

“有什么意见请举手说，别上台抢话筒，也别给我使绊子。否则别怪我让你在全国人民面前出糗！”

最后，再补充一句大实话：“今天，我希望诸位高兴而来，满意而归。我尽可能地带给你们快乐。请大家热烈欢呼，能多热烈就多热烈！为什么？我就是想通过你们的欢呼让电视机前的全国人民都知道，李咏这孙子到这个岁数了，还这么红！”

我压根儿没把这地方当成“演播室”，我当它是“夜总会”。谁呼哨打得响，谁带头嗷嗷叫，我说谁是雷锋，要的就是这架势！

我在节目里一向有个主张——伺候人民。您可以理解成“为人民服务”，但那不是我说的，是毛主席说的。

既然伺候，就要伺候到位，童叟无欺。三岁半的孩子上台，我跪着跟她讲话。是，我的衣服考究，牛掰，镶满了施华洛世奇的钻。那我也跪，跪掉了也不心疼。只要孩子开心，只要孩子的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大姨大舅看着开心。

观众们都很热情。我被他们围在中间，领子被扯开，扣子被扯掉，都是常事。没关系，我回家缝去，大不了下回再换一件。

谁让您是我的衣食父母呢?

好多人爱看我的节目，但是叫不上我的名儿。有一次我在机场，一个小伙子指着我，冲同行的伙伴嚷嚷：“哎，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那个人！”

还有好多人，倒是知道李咏这人，节目却对不上号儿。他们不管《咏乐汇》叫《咏乐汇》，叫“那个吃饭的节目”；也不管《非常6+1》叫《非常6+1》，叫“那个砸蛋的节目”。

当砸蛋遇上扯淡（5）

说实话，我特别感谢他们。在我心目中这已经不叫“厚爱”了，而是“大爱”。说白了，他们没拿我当外人儿。

说着话，台里又开始忙春晚了。长官见到我说：“准备啊，招标春晚！”

“招标春晚跟我有啥关系？”

“你们两口子带着一个优秀团队啊，不试试多可惜！”

“哦？您觉得能招上吗？”我作兴趣盎然状。

“你先说说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让我想想啊，明年是2010年……”我捏指掐算了一下，“哟，想起来了！您说，我在春晚演播大厅的房顶上，挂他2010颗大金蛋，行吗？”

算出来的《咏乐汇》

【还想叫“咏乐大典”？不找抽吗？】

有时候我觉得，我这人啊，挺像一根羽毛——跟那个“或轻于鸿毛”的鸿毛不一样啊——我飞哪儿是哪儿，随遇而安，而且永远不闲着。来阵风儿我就跟着飘，没风我也自个儿得瑟。

2008年，我下定决心，亲手斩除《幸运52》，另立一台Chat Show——中文叫做“非严肃性谈话节目”。

并不是毫不犹豫。岔口就在眼前：拐对了，阳关道；拐错了，独木桥，闹不好再掉河里。长官能否认可、观众能否接受，都是问题。成功学都是伪科学嘛。对于未来，太唯物或太唯心，都不合适。

这时候我看了一本书，说要想成一件事，或者成就一番事业，得“聚信息”。这个说法看起来唯心，实则又挺唯物。你首先得坚信你能成功，“我怎么可能不成？”而完全不去想“万一不成怎么办？”由此激发出正面能量，吸引其他相同频率的正面能量，以达成天时地利人和。

看完这本书，我攒起一股子劲儿，非得把这事儿拱出来。我凭什么不能做Chat Show？原来节目里我都站着，现在想坐下了，不行啊？

我和我的香港制作人、台湾制作人开始闭关海聊，碰出了好几十种节目形式。原则有两个：什么时候人们最放松？什么事情人们最熟悉？我们就选择它作为我们的节目符号。答案当然是吃饭和睡觉。但是考虑到我不能在舞台上支张床请人睡觉，那就只剩下请客吃饭了。

按照我的设想，索性搞一场隆重奢华的“大八卦”。老子也坐下来摆摆阔，设他个鸿门宴，大宴八方宾朋，边吃边聊着。

上午，我向台长递交了一份简单的说明。中午他的秘书就打电话找我，要看详细策划案。我连忙又攒了厚厚一摞资料交上去。临下班时，哈文跑来叫我：“快！台办电话！”我慌慌张张跑过去，接起来，对方说，台长有请。

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台长办公室，台长说：“方案我看了，从框架到细节，都很好。”

我心里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有他这句话，虽然“准生证”还没办下来，街道办事处的章算盖上了。

接下来就是给节目起名儿，太有意思了。

我的台湾制作人说：“叫《咏爷秀》好不好？”

我拍案而起，“你还想不想让我在电视台混了？”好嘛，人家一哥、二哥、三哥的还没弄明白呢，我都“爷”了。

“大爷，听起来，笑傲江湖的感觉。”他继续解释他的创意，普通话说不溜飕，说“大爷”俩字，还偏把重音搁前面。骂人呢这是！

“得得得，打住！那叫大爷！重音在爷上！”

我自己想出个《咏乐大典》。这名字，怎么琢磨怎么意味深长，我美不滋儿地征求大家伙的意见。兄弟们肯定说好啊，恢宏！气派！长官却提醒我：“这个名字，的确别有新意。但它太压人。如果你能承受得起一些别样的攻击，我不反对。”

当砸蛋遇上扯淡（6）

我转念一想，是啊，跟皇上攀亲，不找抽吗？上不着天，下不接地，无论专家学者还是平头百姓，回头都跟我过不去。那又何苦来？假如您姓秦，生个儿子，敢叫他秦始皇吗？

再接着想，我又想出个《咏乐八点档》，挺狂妄，自个儿就把档期给定了，结果被长官训斥了一顿："你以为你想几点播就几点播？"

节目组就这几个人，创意有限，于是我们被迫走上了科学和迷信相结合的发展道路，找专门的起名网站，连起名带算卦，还不收钱。网站给起了个《永远快乐》，听起来粗俗，但说是跟我八字特相合。

最后我想出一个《咏乐會》。为什么是繁体字呢？第一我习惯用繁体字；第二，繁体字的视觉效果好，有那种"隆重奢华大八卦"的感觉；第三，也是电脑算出来的，繁体字笔划多，数字吉利。

我们将《咏乐會》这个名字上报给长官，长官综合考量了一下，说还是用简体字为好。几经磋商，想破了脑袋，除了改成简体的《咏乐会》，我们又提交了另一个选择——《咏乐汇》。

五分钟以后，长官电话来了，一锤定音，"就叫《咏乐汇》吧！汇聚的汇。"

"哦，您还是觉得这个字儿好？"

长官含糊其辞，"啊对……那什么……我们算了一下。"

合着长官也走的是科学和迷信相结合的发展道路。怎么算的，我当时没敢问。据小道消息称，一共两位长官，一位算出"会"好，另一位算的是"汇"好。后面这位官职高，所以就以他算的为准了。无论如何，我知道他们是对我爱护，希望我成。

【李咏卖拐，生意不好做啊】

录样片的嘉宾，我第一个想到了成龙。我和成龙大哥之间的交情，怎么说呢？他曾经戏言："我在北京有一群猪朋狗友。"这其中应该算我一个。

去年4月，我参加了成龙大哥的生日Party。那时我刚有《咏乐汇》的构想，试探着问他："大哥，我正在研发一个新节目，到时候，能不能请你帮个忙，为我捧场？"他很爽快就答应了。

节目正式启动已是9月，他正好要到北京参加《龙的传人》活动，主动打电话给我："你的节目是几号录？"

没想到半年过去了，他仍把这件事记在心里，我非常感动。录节目当然以他的时间为准，我们立刻安排演播室，做好一切录前准备。他也专门提前一天从香港飞到北京。

大哥头天晚上喝了酒，闹晚儿，两眼通红。化完妆后，他两臂大张开，趴在化妆间的桌子上说："让我休息会儿，五分钟就好。"

当时大家都很担心他的精神状态。哪知五分钟后，我在舞台上看到的成龙大哥，目光炯炯，神采奕奕，跟先前判若两人。

这就叫专业精神！

做完节目当晚，我们又见了一面。他很诚恳地问我："上午录节目，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吗？你告诉我。"

"大哥，非常好，哪儿哪儿都好，真不是我恭维您！"

《咏乐汇》做到今天，我与五十多位江湖人士交过手，嘉宾来自两岸三地。成龙大哥只是港台艺人最具号召力的一个代表，职业、谦逊、彬彬有礼。这或许得益于一种较为完善的经纪制度。相比之下，我们内地的一些"大腕儿"，实在有点儿太那啥。我就不说具体事儿了，还是赵本山老师总结得好："啥名人啊？就一人名！"

样片录完了，交到编委会审批。那天我们正在大兴录制《非常6+1》，哈文兴冲冲从台里赶过来了。"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，编委全体鼓掌通过！"

当砸蛋遇上扯淡（7）

“哗——”大家伙激动万分。

“不过——”哈文拖着长声说，“有两点还需改进。”

我们立刻安静下来，作洗耳恭听状。

“第一，那个大水晶吊灯，太晃眼。第二，李咏，你手上那个大钻戒，太扎眼。”

“成，这都好改。时间段说了吗？”我眼巴巴地盯着她。

“周六晚上7:45，怎么样？够黄金吧？”

那是相当黄金啊！谢谢诸位长官了。

节目一开播，好评、恶评就都跟着来了，这倒是意料之中的。一些媒体忙着给我定调子，说：“李咏通过《咏乐汇》转型高端。”拜托，别把我架那么高，行吗？架势是个高端的驾驶，聊的还是家长里短。娱乐娱乐，贼心不死。

又有人问了：“不是说《咏乐汇》是《幸运52》的升级版吗？”您别听人家不懂瞎说！升什么级？您当是升官儿呢？我整个换了一个状态，另起炉灶。没看我从站着变坐着了吗？

也不是转型，也不是升级，那跟以前区别在哪儿啊？

我跟您说，区别就在观众群，可是和以前大不一样！以前我的粉丝儿都是大街上削菠萝的，一停下车等红灯，他们就凑上来跟我打招呼，关系可好了。现在，我听同事说，专业数据显示，《咏乐汇》的观众里文化最低的都是高中毕业，看来我们节目的口号还真能唬人。

我们给节目打出的口号是——“汇聚天下英豪，笑谈人生智慧。人生百味，尽在咏乐汇！”显然这些高中以上学历的观众朋友都是冲“人生智慧”来的。

长官教导我，做节目要学赵本山老师，走“卖拐”的路子。这话怎么讲呢？就是让我把嘉宾最重要的几个“人生拐点”套出来，让观众知

道他是经过了哪几道弯儿，方才到达“成功的彼岸”。说了半天还是“寓教于乐”。

这拐卖不下去啊。节目总共就一小时，前头寒暄寒暄，后头客气客气，中间再尝尝菜，品品酒，还能剩下几分钟听我忽悠？有时候他那人生的弯儿拐得挺大挺陡，再加上诸多外部不确定因素，还真不便深挖。老挖它就老有的挖，挖着挖着就成《百家讲坛》了。

还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吧。我们充其量找出几个人生中的闪光点，回忆回忆，感慨感慨。嘉宾触景生情，群众看个热闹，就完。

【他们玩儿围棋，我玩儿跳棋】

过去，我跟普通老百姓打了十年交道，我的节目从来不缺选手和观众。一听说咏哥招呼，前呼后拥就来了。现在情况发生了一点儿变化，据外联组的同事说，一半以上的嘉宾听说是李咏的节目，都不敢上。

啊？我又得罪谁了？

很快我就明白了，因为他们怕我，不知道我一张嘴会喷出什么来。

我们节目的定位不是汇聚天下英豪吗？您想想，都英豪了，肯定不比小濮有名，就比老潘有钱，要么就像余大师一样有学问。哪回上电视不是被吹捧着，仰视着，绽放点儿生命中的光荣与梦想。遇上我这种没正形儿的主持人，见年轻人叫大侄子，见老年人叫二大爷，万一八卦他们一下，都不知道怎么往回找补。

我也挺悔恨的，我这10年，都给人留了些什么鬼印象？居然让英雄豪杰们闻风而逃！

我自己在节目里，其实也有三种状态。面对像余秋雨老师这样的学者，我只有倾听的份儿，插不上话。面对李开复、李彦宏这样的IT界、商界精英，我倾听改聆听，还是插不上话。有的娱乐明星也深沉，比如赵雅芝老师，任凭我怎么轻佻，人家就矜持地坐在那儿，不

接茬儿。唯独和成龙大哥、容祖儿他们，我能耍到一块儿去，场子能活起来。

太尴尬了！我还一向自诩“在嘻哈中思考”，其实人家有思想的都不买我账。

记得跟小濮一块儿录的那期节目，我们之前也没见过面，上场以后坐一块儿现找感觉。一开始甭管我怎么打镲，怎么自嘲，小濮都一言不发，笑盈盈地看着我。我不怕粗俗的，就怕文雅的，心想这是怎么话说的？您看耍猴呢？

多亏了我家大厨和小二，及时地送上了五粮液一瓶。我和小濮连干三杯，他就“将进酒”了。话匣子打开，掏心掏肺。这就是请客吃饭的好处，只要拉开架势，摆出诚意，没有谈不成的事儿。

对于那些上来就提防着我的嘉宾，“真诚”这招确实好使。我一真诚，大家都懒得戴面具了。在我的舞台上，俞敏洪表演过插秧，李彦宏跳过探戈，马未都唱过《红灯记》，李开复玩儿过魔术，余秋雨示范过什么叫“锄禾日当午”。

《咏乐汇》播出以后，最多的质疑，就是说我在模仿那什么饭局，什么有约。为了有个应对的说法，我就对媒体讲：“我这节目是个四不像。新闻不新闻，娱乐不娱乐。”哈文补充了一句：“四不像也有名字，人家叫麋鹿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！”

小崔老师有思想，做节目如下围棋，绕你，绕出他想要的东西为止。

小白老师有深度，做节目如下象棋，只能前进不能后退，有步骤，有口诀。

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玩儿跳棋。别看跳棋简单，就是些不值钱的玻璃球，规则都一样——谁先抢占阵地谁?赢。我走出一步，就想到五步，也要动脑子的。你进我退，前拦后堵，不需要智慧吗？而且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跳棋可以大家一起玩儿，你象棋六个人下给我看看？

说到底，电视是个消遣。超市货架上摆的那些东西，还隔俩礼拜就调换调换呢，电视节目也一样。作为商业时代的消费品之一，我不提供沉重的价值观，也不想和谁一争高下。

我在上面吃着聊着，您跟底下听着乐着，就挺好，乐一时是一时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谁还想当老字号不成?